

# 記 憶

REMEMBRANCE

2009 年 1 月 31 日第 3 期

总第十三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 本期目录

### 国史笔谈

[史 云](#) 为了不忘却的记忆——答指正拙著之诸友

[陈益南](#)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

###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上）

### 风云人物

[王广宇](#) 肖力在中央文革

### 蓦然回首

[石天河](#) 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

[杨 政](#)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央 皿](#) 不要参加“走资派”

### 文摘

[丁 东](#) 《朝霞》事件的思考——陈冀德《生逢其时》读后

### 故纸堆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有关](#)“鸡血疗法”的传单（摘要）

小资料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一、[印红标寄语编者](#)。二、[庄菁瑞来信](#)谈十二期及历史研究

---

### 【国史笔谈】

按：本刊从第六期开始，设立了“国史笔谈”专栏。在八期的篇幅中，陆续发表了丁东、余汝信、阎长贵、唐少杰、蓑笠翁、何蜀、丁凯文、徐友渔、赵诚、陈益南等人评论国史八卷的文章。这些海内外学人对八卷臧否褒贬，各抒己见。无论是宏观之议，还是微观之争；无论是一孔之见，还是多方置疑，都从不同角度切实有力地推动了文革研究。为了提高本刊的学术水平，也为了促进作者与读者的良性互动，本刊邀请史云先生（八卷的作者之一），对上述论者的评论做一总结性答复。史云先生慨然命笔，对前一阶段的评论从三个方面做了答复。尽其可能地回答了论者的问题，阐明了作者的立场观点，说明了在特殊语境下撰史的难处以及不得不采取的写作策略。在“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世风之中，这种坦诚交流的学风尤为可贵。我们希望，这一学风将在这一平台上继续下去。

## 为了不忘却的记忆 ——答指正拙著之诸友

史 云

80年代初和几位同道（包括李丹慧女士）一起编撰文革大词典时，已深感出版之难。有人说，等到文革结束20周年就好了。20周年的时候，瑞典的沈迈

克先生戏言：还得等，重要当事人还有活着的，还没成为历史。现在，30 周年过去，代表那个时代的华国锋也故去了。我们这些不重要的还活着，依然故我。

感谢网络，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是我看到《记忆》上诸友对拙著的评论时，一下想起的。不多说什么感谢写述评的人的话了，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我，我也不是为了他们。都是为了那不忘却的记忆。

我把《记忆》上对拙著的述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观点、立场、基本认识方面的。第二类是史实辨误方面的。第三类是写作框架、方法论方面的。

**关于第一类**，有些评论言辞十分尖锐，近乎“彻底否定”。主要批评是：“所持立场未脱大陆官史的窠臼”，仍然是把毛与林江集团区别开来，把周写成中流砥柱……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文革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对其的评论首先是政治上的。就拿《记忆》的读者、作者的认识来说，按照文革时期的划分，何止“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过去说：道不同，不相谋。而今天我们可以谋，但大的方面谋出一致看法也不大可能的。姑且谋那些可以谋的，算是存大异、求小同吧。

倒是余汝信先生的“新瓶装旧酒”，引起我的深思。我的本意，恰恰是想“旧瓶装新酒”，哪怕是一点新酒。

所谓旧瓶，就是长时期在内地从事文革研究形成的思维。这并不是一味地守旧。因为，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我至今仍然认为，毛和“四人帮”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他是在进行一场冒险家式的破坏探索，探索如何走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官僚领导层发生异化，脱离群众，最后与群众对立结局的道路（06 年密云会议我即持此观点）。一个简单的问题——以毛文革前夕的绝对权威地位，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政坛对手（是不是对手还值得怀疑），他本无须去发动亿万群众，搞这样一场使他自己地位实际上发生根本动摇的社会大动乱，本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专政机器铁血清洗手段。试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敢号召群众起来“反党”，炮轰从生产队长到国家主席的当权派？即使是我在书中进行比较的、意识形态最接近文革的阿尔巴尼亚，也只敢进行“思想文革”，而不敢把打倒“走资派”付诸行动。

当然，领袖人物的言论、心态，不是固定的，是在不断变化中。毛就不用

说了，文革中说了不算的话，比比皆是。比如“砸烂公检法”，他在1967年就说了多次，后来又推卸责任。如周，在文革中与江青也有不少亲近的姿态，甚至是共同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异是远大于同。使用了翔实资料的《晚年周恩来》（只有个别地方使用资料莫名其妙，我想另有原因），我读完了得出的印象，周与江在文革中仍然不是一伙，周仍然不是伪君子。而是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下，周的苦心经营、言不由衷，甚至低三下四，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新酒，就是力图通过一些史实的叙述和考证，提供一些新的结论和视角。做到了没有？我不敢说。虽然有丁东、长贵、少杰、赵诚等先生的一点点肯定和鼓励。

至于“各卷内容均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建基于档案、文献、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以至新公开资料、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务求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之类的话，我也只当广告来看。起码就拙著，是不能说这个话的。袁笠翁先生用标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来批评，我完全接受。这是真话，在意识形态方面，我没有也没想去有什么突破自己的认识。一百个人看文革，会有一百种感触。何况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呢。

我只能说，尽管在不少新酒的外面，还包装上旧瓶。但是有一定水平的读者，应该能得到一些启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也就是拙著《导言》最后一句话——“至于那些事实背后的真正含义，则相信读者自己会得出结论，又何必由作者来下呢？”其实我看到评论者如赵诚先生根据拙著中一些史实，得出的有关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深刻认识，我也是赞同的。当然，也有很多的观点并不敢苟同，需要时间再探讨。

**关于第二类**，来自史实方面的批评，我最为重视。长贵先生说得对，以一个人之力写文革的大部头著作，是太难了。但是做到史实方面的没有大硬伤，则是基本要求。所以，我看到汝信、何蜀、友渔等先生不留情地指出很多硬伤，如“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的张冠李戴，真的要流汗了。同时又非常感激，并尽可能地在重印时改正。下面分别做点简单的应答。

一、余汝信先生对拙著关于“红都女皇”内容的批评，是正确的。书中一个引文，确实是转引自他的文章。当时因手头没有维特克原著，就暂且先注上

了该书，想等拿到书再核对引文，不想竟然忘记了。这里要向余先生表示歉意。

余先生指出港版“红都女皇”一书并不存在，也是正确的。此事我过去也有点存疑，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该书？但是王年一先生文章那样写了，又有当事人张颖女士的回忆著作（我曾问过张的公子，也是位著名党史专家，告我粉碎“四人帮”后，他母亲曾拿回几本书，其中好像有《红》书）。所以我轻率地在《难以继续》中采信了，但也用了不少“也许”、“可能”一类的不确定语言。这次又联系香港、台湾方面，多方查找，确认无此书。这是余先生的一个功绩。

至于张颖的书中引用江青的话是否可信？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粉碎“四人帮”后，外交部为了查证和批判，曾经内部印过部分江青谈话记录内容（手头有再翻印的部分内容），张书所引江的话，我推测就是来源自此。否则她时隔多年凭回忆，书里不大可能有那么具体的大段引文。维特克因为不懂汉语，又没拿到原始谈话记录稿，维书所写，应该是自己记录的经过翻译的要点（翻译是否给她忠实翻了江话的全部，也值得怀疑），准确性也要大打折扣。

关于江青是否给维特克看了作战地图？记得看过 90 年代总参测绘局的一位高级干部写的文章，介绍了他当时为江青准备抗美援朝战争地图的经过。当然送给维氏是不可能的。发表文章的杂志我保存了，一时没找到，有时间找出来再做结论。

二、拙著中一些说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注明出处，这里只能遗憾地略举一二做些解释。

关于丁东和长贵先生的一个质疑：“天安门事件他（毛）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泽东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文革后毛远新在被关押中，还在表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658 页）

长贵先生指出：“我给正在南昌照顾 98 岁高龄老母朱丹华的毛远新打电话询问此事。他听后，说这是瞎编。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

书中这段话，来自于 1980 年中纪委两案办负责人在中央一次会上的发言，写入了会议简报。我查毛远新在关押中写的一些交代和申诉材料，确实有这类话。也许毛远新真说了，年久不记得了；也许他当时迫于环境，杜撰了推荐华的表功话，都有可能。

三、关于丁凯文先生对书中仍用林彪集团称呼的批评，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丁是研究林的大家，所言有道理。拙著中不用犯罪集团或者反革命集团，至多用了野心家集团（文革中这种人是最多的），也算有一点接近吧。集团一词，本无所谓褒贬，如联想集团。这里只是把文革中有共同利益关系的林等人，用一个集团来归纳一下。黄吴李邱显然是和江集团不一样的。他们跟着毛打江山，属于老干部阶层。即使被判刑多年才释放，他们对毛和林的评价也处在矛盾中——既要否定毛对他们的打击，又要肯定毛历史上的功绩从而肯定他们自己。既要和“九一三”的林撇开干系，又要肯定过去追随林的革命生涯。拙著将“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分类，作为林立果上台的政纲观点，意即在说明林集团的基本立场。

丁先生说：笔者注意到《难》书里的一条材料“在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就要汪东兴告诉周恩来，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起来。”《难》书还说“当十天后的 9 月 23 日毛泽东再次要汪东兴追问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

丁先生说：《难》书作者认为，周恩来没有采取措施控制黄吴李邱是为了保护军队将帅和中央领导人，宁可“纵容”黄等人销毁有关“罪证”，显然于史无据。

丁先生确实很敏锐，笔者这条事实，只淡淡一提，也没有注释来源，却被他抓住了。这个来源是 90 年代汪的回忆，简述大意：“九一三”后，毛对周说，对黄吴李邱看十天，如果主动检查交代，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十天后，毛生气地问汪，他们不检查，为什么还不处理？要汪去找周。汪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找到周说：十天期限到了，主席催了。周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两人见到毛，毛生气地要周赶快处理。周说第二天就办。

这个内容在汪书出版前审查时被删去了。是否汪编造的假话？也可以再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汪可能会编些假话，尤其是对自己有利的話，但似没有必要

在周的问题上编假话，动机何在？汪书中也确实有很多不符合史实的细节，根据我看到的录音整理稿，与后来出版的书相差很多。不懂文革历史的整理者不仅随意改写，而且画蛇添足地加了很多内容。这也是汪书被质疑的一个原因。李志绥的《私人医生》一书则更为明显，大段内容完全是根据其他不可靠的书移植过去的，很多甚至赤裸裸地编造。做口述史者，不可不引以为戒。

赵诚先生问：如1972年5—6月间为什么毛让周主持批林时，要周谈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后来1973年11月在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又有了借中美交往中的事，找碴开了“帮周会议”。使周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摧残。……关键处还是让人有些读不明白。

这个问题，《晚年周恩来》其实已经有了判断——毛不想让周接班。拙著里也引用了一些该书的及自己的分析，只不过淡化处理了。也许，领袖的行为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蕴藏着巨大玄机 and 关键，也如我们凡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经常干俗事。

赵先生指出：“在1964年中国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之际，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相同的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建议，那时被苏联拒绝了”。这句话出自什么文献，应有说明。

这个史实来源于《赫鲁晓夫回忆录》、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等。是应该注明的。

其他有关史实，可供讨论的地方实在太多，这里就不一一作复了。

**关于第三类，写作框架、方法论方面的。**

徐友渔先生批评说：历史学家阐述事实时应该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旁观者的口气，不应显得是问题中人、是非中人。他所指的那些形容词，拙著确实不该用至少不该多用。不过他说“居高临下”，我还是没有这种境界的。不知道读者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拙著中经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叙述，而并没有给出结论。“问题中人”，恰恰代表了我写作时的心态。其他卷也有这类情况，沈志华先生认为，不一定要做出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死不改悔，提供几种可能留待大家讨论也是有益的。记得是爱因斯坦说过，找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因为需要洞察力。

徐先生还批评拙著不像国史而像党史，这是我颇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是

多年来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如何区别党史和国史？但到现在还只能遗憾地说，至今没有找到根本性的区别，尤其是文革时期。原因徐先生自己已经说了。

我所努力的，是不单纯写成文革史，尽量写成文革时期的国家史。拙著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解说外交和经济，这至少应该是作为国家的形式，而不是党的形式。也用了相当多文字来分析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70年至75年宪法等等，还把围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四次斗争作为70-75年上层斗争的主线。尽管如此，仍然是有着太多的毛个人意志的框架，这是客观决定的。

同时，拙著中也专辟篇章来解说群众和社会活动、思潮，但仍然很不够。何蜀先生批评说拙著仍然是重点在上层斗争，这是十分真切的。一方面我的研究在群众、社会、思潮方面十分薄弱，难以描述那个动荡的社会。拙著中不少地方是借助印红标、杨健等的大作来填充的。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也确实非一人一书能写清楚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万花筒转动时的一个角度的成像。所以，我也就知难而退了，不干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多考证点上层秘闻吧。

有朋友问，接班人分析了周、张、王、邓，为什么不写华。借此说明一下，根据主编的安排，华的生平活动，由韩钢先生在下一卷中写。

也有人对拙著中有些说法经常不注明来源提出批评。这里衷心接受，也希望读者体谅苦衷。我只能在直接引用已经公开的档案时才做注释。

曾和一位澳大利亚研究文革的学者交谈。他千方百计地想套点档案资料，我则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他忿忿地说：你们就是掌握资料独享，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我回答：你们就是有话语权，不像我们受限制。双方都说了些气话。这反映出当前文革研究者的一些客观条件造成的分野。

境外学者多以抨击体制的言论而蔑视官方学者“思想僵化”，官方学者则倚仗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嘲笑境外“道听途说”，比较中肯的大概是境内的非官方学者，如大学、一般研究机构等的一些非专业研究文革者和亲历者，两方面都能交流利用，而有独到的采访调查优势。内地文革研究的有高价值的作品，多出于他们之笔。如少杰先生的清华文革史，如海亮先生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专著，如红标先生的文革思潮研究。至于拙著，能起到一点澄清史实的作用，或者提供些新的探索，也许就达到目的了。弄成“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也非我愿。更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盛名可言。文革，是亿万人用自己的身心去写的。

90 年代，接待两位加拿大的记者谈文革历史。谈了一晚上，临别时，两个老外称羨：你们有这样的精彩写作题材，真好！能出多少个诺贝尔文学奖啊！我愕然，无语。

为了文革不被后人忘却，不被外人称羨，我们还要努力。谢谢编辑《记忆》的诸君！

---

## 【国史笔谈】

#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 ——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

陈益南

工人及农民中的造反活动，是文革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篇章，文革的所谓群众运动之中，工人的造反活动力度，甚至比红卫兵运动还要强烈，还要持久。红卫兵运动，不论是造反还是保守者，不论是专门殴打老师杀害地富分子的“红八月”红卫兵，还是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的“首都三司”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都只有最多二年半不到的活动时间，而均于 1968 年底前后因上山下乡及进工厂，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波澜壮阔几起几伏的工人造反活动，却贯穿了文革的整整十年，构成了文革历史极为重要的篇章。

在文革中产生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中，作为红卫兵代表的中央委员一个也没有，候补委员也仅有聂元梓、陈敢峰 2 人（聂其实还是一个老干部，不能算真正的红卫兵——学生代表），而工人造反派代表却至少有 20 人以上，成为了中共九届、十届中央的委员与候补委员。由此，亦可见工人造反运动在文革历史中的不轻份量。

然而，很为遗憾的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简称《国史》）中，专门论及文革的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革的动乱与浩劫》，下面简称《砸烂》）和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下面简称《

难以》），对工人及农民的造反活动，却没有能予以整体、客观，或侧重的叙述与论及，没有能体现工人造反活动在文革中的应有历史地位，而只有轻描淡写，寥寥数语，匆匆带过，根本不能让读者看清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活动之面貌与性质，更遑论让后人正确把握与解读这一历史活动了。

此二书在这方面的重大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叙述极少，篇幅太小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一项重头大戏，它不仅贯穿于整个十年文革时期，而且涉及的人数之众，在世界历史中都少见。所谓文革“有亿万人民参加”的表述，之中，工人造反派群体就占有极大的比重。并且，当时的中国社会底层所发生的很多事件，大多与工人造反活动有涉，或与其有重大关联。但是，在这二部书中，却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叙述解说，所用篇幅之少，与这一史实在文革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例如：《砸烂》一书中，论及造反与造反派活动的篇幅，虽有一些，但是，却主要是以红卫兵、特别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的活动为主线与重点，而对工人造反派的活动，包括对北京工人造反派的活动，则均极少涉及。虽然，在一些事件的相关章节中（总共有十多页内容）也断续谈到了上海“工总司”、全国“全红总”问题，在五十页左右的论及各地造反夺权内容时，也点到了各地一些工人造反组织的名称，但是，从整体上看，却未能对工人造反活动过程的情况予以细谈。

1966年秋冬之际起，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止，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活动的高潮时期，然而，有着800多页之巨的《砸烂》一书之中，竟只有百分之十不到的篇幅，零散涉及到工人造反活动。

而《难以》一书，对工人造反活动的叙述就更少了。书中对批林批孔运动时发生的新一轮造反活动，叙述极少，仅仅只用了几个页码的篇幅（只说了浙江、湖南、黑龙江及安徽淮南这几个地方）。

文革中波浪壮阔的工人造反运动，一直是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的重头戏，《难以》作为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国史，却只用区区几个页码（P47、P362—369）、仅六千多字的篇幅（只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来叙述，未免太不足了。

对文革中那么大规模、且长达十年的一种民众运动，作为国史，居然只有寥寥几笔，显然，这太说不过去了。

## （二）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在已经是很少篇幅的有关工人造反活动的叙述中，其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砸烂》一书中谈到工人造反活动时，点到了批判领导干部、夺权、武斗等内容，然而，对工人造反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原因，却没有任何表述，好像工人造反是文革中不言而喻从天而降的事，不需向读者向历史做出交待。

实际上，文革之初，即 1966 年 9 月后，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因为支持学生造反，致使大批工人被各地各单位当权者定性为“反革命”、“新右派”，予以批斗、整专案材料、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甚至由公安局拘捕的重大事件。

对此，《砸烂》一书，虽然也提到了当年 10 月 5 日、11 月 15 日分别由中央军委下达的《紧急指示》与北京市委所发的《紧急通知》中，说到了前段运动发生了各单位党委将学生或“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内容，然而，该书却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做出进一步说明，也更未能就由此之后又发生的各地挨整受冤的人们大规模赴京告状的“盛况”，及先后开始成立了各种造反团体（特别是工人造反组织）的史实及其逻辑关系等情况，予以应有的叙述与论及。因而，导致读者对这一段历史，在书中只是看到造反派民众对各地当权者的批判批斗，却无从了解这些事情发生的起因，更看不到工人造反活动当时是如何兴起与发展、壮大的情况。

并且，该书即便在说到某些工人造反活动的内容时，也往往由于篇幅太少，多是无头无尾的断章，而没有做来龙去脉的说明与交待。

例如，谈到湖南以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湘江内雷”时，却不讲述其百万之众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不讲它这个组织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也不交待这个组织当时对湖南文革有什么影响，而只是用寥寥几笔说了它批斗省委书记与它自身又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的批示予以镇压这两件事。可是，这一来，所有不了解湖南文革情况的当代与后代读者，也许都会对此产生疑问：明明是一个造

反派组织，为何却又会遭到中央文革这个天天号召人们造反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批示，而竟被镇压呢？虽然，事实确如书中所说，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不完整叙述，的确会导致读者对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活动无法获得明晰的了解，从而也就大大削弱了作为《国史》的份量。

《难以》一书也存在这类问题。

众所周知，工人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又掀起了一次很大的造反浪潮，在社会底层，这次造反几乎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但《难以》一书，对批林批孔中为何又一次兴起了民众造反活动的真正原因，也未有任何着墨。却有失偏颇地说，这一轮造反，是由于造反派“急于恢复与扩大权势”（P367），是“前段支持造反派，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试图东山再起”（P367）所致。

事实上，自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至1972年间，全国各地包括工人造反派在内的造反派们，在中央布置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除上海等极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都已遭到各种形式的整肃与镇压，相当多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则被关进了监狱。对于批林批孔前夕所存在的这些严酷史实之背景，《难以》一书，却一点也没有说到，更没有将这些情况与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造反派又一次崛起的局面，联系起来论述。

这种选择性的片面表述，显然，极大地损害了《国史》的价值。

《难以》在书中宣称，只有1976年的“四五运动”才是“真正的造反”，那么，这文革（包括批林批孔）中的民众造反，特别是工人造反活动，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活动的性质，是属于“奉旨造反”，还是“借旨造反”？或者是二者皆有？

可惜，这二部书都没有很好地表述这个问题。

甚至，没能将这个文革历史的重大组成部分，在《国史》中呈现给读者。

### （三）有失客观性

如何认识文革中包括工人造反在内的民众造反运动，由于众所周知的禁令等原因，致使文革结束32年来对这一运动的宣传及舆论，显然易产生片面性，有失客观性。

但既是国史写作，便不能绕开、淡化这个问题，更不应以显然有失公正的片面资料为据。对那一段历史，应有较为客观、或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而不是片面地按现在对文革历史采取不正常态度时的评说为据。

然而，《难以》一书，没有做好这一点。

例如，该书中，对造反派活动的评述，充斥了“进行夺权”、“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帮派分子”、“煽动反对省委”、“诬蔑攻击省委领导人”、“支持造反、犯有错误的少数领导干部”等非公正词语。

实际上，造反派“夺权”的活动，在文革初的1967年间有过，但批林批孔中不存在这种情况了，而顶多只发生造反派欲参入地方政权做配角、以分得权力中一杯羹，由此保护自己不再坠入“反革命”泥坑的情况。

而所谓“诬蔑攻击”、“犯有错误”等语，更是官方单方面的政治评判，不应作为历史学术著作的用词。

#### （四）个别史实中的表述不确

《国史》的这二部书，也存在某些史实表述含糊、不准确之处。

例如，在《砸烂》一书中，说到1967年8月湖南道县发生的杀害几千名无辜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重大惨案时，却没有鲜明指出，惨案的行凶一方，并不是造反派，而是含含糊糊冠以一个“派性武斗”引发的“群众专政”性质事件。

事实上，这件当时与后来都震骇了世人的惊天大血案，其肇事一方，并非造反派（当地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县“革联”），而是与造反派对立、并得到该县各级党政军（县武装部）领导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方面的人。然而，《砸烂》一书，却回避了这一点，通篇都含含糊糊只说其是“群众组织”。

众所周知，文革中产生的群众组织，各自产生的政治基础与斗争方向，都有差异。而造反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这二大派，更是存在尖锐对立的巨大区别。它们在文革历史中所处的责任地位，也完全不同。因此，作为《国史》，应旗帜鲜明地在论述文革历史时，实事求是地做出客观叙述，而绝不应含糊。

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是文革历史客观存在的一部分，现在清楚明晰地论述它们，并不是什么重划派性，而是对历史负责。

此外，书中还存在个别与史实不符之处。

例如，《难以》一书中写到的湖南造反派人物，就有二处史实错误：

(1) 将唐忠富说成是省革委副主任(P367)，其实，唐只是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

(2) 说胡勇是“犯错误的干部”，将其与原省委、地委书记章伯森、张厚并列(P367)，其实，胡勇是造反派工人。虽然造反派头头当时也可称新干部，但显然，这“干部”一词，在该书中是不属于造反派的，因为，连中央委员唐忠富的身份，在该书中都是用的“造反派工人”表述。

文革结束 30 多年了，对文革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多年。但是，笔者发现，在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这一领域的清理与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工人造反活动的兴亡情况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更是常常被忽视、弱化。实际上，工人造反活动是始终贯穿于文革历史之中的极重要内容，是文革时中国社会底层的主要政治现象之首。显然，研究文革，不可以忽视这个领域，作为涉及到文革的《国史》著作，更不应遗漏、淡化这个领域。

2008 年 12 月 22 日于长沙

---

【他山之石】

## 体制化的造反：

### 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 (上)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译

## 译者前言

Joel Andreas (J·安舟) 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对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和中国社会问题颇有研究，其撰写的博士论文

《*Persistence of Privilege*》(直译为《坚持特权》)(或译为《特权的持

续》)的英文打印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极少数学者中流传。安舟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交给一些国际会议，一些章节和后续研究的论文(英文)，在海外一些中国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他也就其中阐述的问题，在北京等地的某些学术沙龙做过报告。读过和听过安舟报告的朋友反应各异。有的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的说他是西马学者，也有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学者或自由主义学者，甚至有人说他是托派学者！一个自称清华红卫兵领袖的朋友，干脆说不知其报告说的是什么。

据 J·安舟自己回忆，他还在孩提时候，就随其左翼知识分子的父母，参加过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和政府的激进运动的游行……而那是与中国红卫兵运动同时代的政治运动，都是挑战二战后确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的世界性的群情激荡。可不可以说他自幼就受到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或泛左翼运动的熏陶？而他的《坚持特权》就是一部严肃的左翼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报告，很值得中国社会研究者和文化革命的研究者阅读讨论。

我们不善于也不需要给学术论说和学者个人贴政治标签。所有接触过安舟的学人，都为他的坦诚、亲和，他的执着与悉心的研究精神所感动，特别是他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问讯和调查了大批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与教师、干部职工(乃至其他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人)，其涉及面并不亚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和文革研究者。这些被调查者的思想、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在安舟的论文里有极为充分的记述，作者以他域外人的客观见解和西方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对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爆发的自身特征，清华——乃至中国社会何以出现文革运动，做了他的独到的解析，也对毛泽东自嘲“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后期文革，进行了批评。我们知道，文化革命以前，蒋南翔校长以他

30年代革命者和17年（1949-1966年）高等教育领导者的身份，提出了著名的“双肩挑”的“又红又专”的——“清华牌”政治/技术干部培养的模式，这种培养的典型模式，在当时也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一种学习、仿效的楷模，甚至是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心目中的接班人培养模式。不管这种培养方式的目的和效果在毛时代如何，也不管毛本人认同程度如何，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们已经清楚看到蒋校长的政治文化理想所产生的深远效应：优秀且理想的“清华牌”干部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昨天和未来。要研究毛以后的政治文化、科技思想，而忽视清华大学历史，是一个绝大的失误。

在文革运动的红卫兵造反阶段（暂以1966-1968年为时限），著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中的激进派别，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口号，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以异端的方式，置疑、反对蒋氏的干部培养模式，其中也包含着对共产党的特权化制度的担心。毛泽东本人一度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认同过这种十分激进的倾向。但“运去英雄不自由”几乎贯穿了毛的文革始终，况且他对于清华的两派，内心始终是矛盾的。如果毛泽东活到现在，他会认同与忍受清华大学现状和高校战线的实际——乃至惊人的中国“巨变”与“巨不变”吗？而“心雄万夫”的清华大学的精英们，包括当年竭力要反抗特权的蒯氏，现今也未必会去鄙视局外人安舟所蔑视的特权。安舟引证了许多清华“凡夫俗子”言谈、事例，使读者观之如近在咫尺；虽然他一再引用的西方政治学概念，对于老年读者确实有些“不简易”——语境差异和文字晦涩。

此文的译者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人，我们借用安舟的“出口”——“进口转内销”——在内部流传，以飨广大读者。尽管文字也经过安舟本人、海外华裔学者和个别运动亲历者的校对，特别经清华文革研究者唐少杰教授的修改，但由于



译者未亲历清华文革，且中英文水平有限，所译文字未必准确达意。希望清华大学文革的当事人和其他研究者提出意见。至于原著中涉及到的当年清华大学真名实姓的各种红卫兵朋友，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公众人物和历史研究的对象，请不要有何不安；音译的姓名如有出入，也请见谅，译者和校对者都无法再去一一查证。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文本，并不针对任何个人，不做任何价值判断。

不认真读读左翼学者的研究，就不一定知道 1960 年代中国高校为何发生批判现实的文革，为何出现激进的“蒯派”。从社会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角度看，文革究竟结束了没有？为什么还要研究文革？安舟的研究，告诉我们清华大学文革中出现过什么样的荒谬，为什么文革不能达到激进的红卫兵理想的目标？为什么精英知识分子要批判文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今后也能有海外右翼学者研究中国高校文革的文章译介给国内学界。

中国文化大革命业已成为许多学术讨论的课题，但是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几年的动荡岁月。从 1966 年毛泽东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结成造反组织，抨击他们在学校、工厂和村庄的共产党官员开始，中国出现了戏剧性的暴力骚乱，学者们很自然的为那个时期所吸引。随之而来的派系斗争把中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此后毛授权压制那些响应他的号召造反的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始于 1968 年镇压不受控制的派系斗争，终于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在这个阶段党和国家机构逐步重建，重建工作是在毛泽东的激进纲领的限制下进行的，而这个纲领继续引发政治和社会上的巨大骚乱。该阶段体制化的实验本应受到更加认真的审视，可是情况远非如此。

本文检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清华大学实行的独特的领导体制。清华是中国最早的技术院校，中国共产党现任领导班子中一些最有权力的成员也出自清华大学。<sup>(1)</sup>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激进派严厉地抨击精英教育和党的官僚作

风，这所大学成为他们的基地。这使得清华成为一个非同寻常但又极其有趣的例子。这些激进派高喊着文革口号要限制共产党干部的官僚权力，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统治的机构中建立权威是饶有趣味的。

在此阶段，清华的领导体制可被视为毛泽东和他那些激进的追随者们“体制化造反”的一个尝试，学校的权力划分给工宣队（工宣队由校外的工人和军人组成）和学校的老干部。宣传队负责动员学生和工人批判教师、领导和学校干部。执政的共产党（包括在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传统的领导方法是遵循统一的理念并有一套明晰的权力等级，现在这种权力分割的结果却制造出一套乱哄哄的领导体制，两者彼此格格不入。我将考察清华的这套体制实际如何运作并分析其原因：这套体制也衍生出常见的政治庇护和附庸心态的问题。其后将谈及该时期的这种体制如何符合于全国范围内更普遍的一种模式，我认为正是这个模式促成了干部和造反派之间的权力分割。<sup>（2）</sup>

### 将派系斗争纳入体制

1966年夏至1968年夏，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清华大学也处于学生领导的各对立派系的控制之下。学校的“激进派”反对以前的领导班子，要求和过去彻底决裂，而“温和派”要维护现有局面。双方均是由学生、教师、干部和工人组成的“战斗队”的临时联盟。1968年4月，这些派系间持续升温的暴力对抗导致了至少十二人死亡的“百日大武斗”。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大约三万名非武装的工人进校以结束战斗。<sup>（3）</sup>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年以不受控制的政治斗争为特征，这个转折点标志着该阶段的结束。全国的派系斗争由此受到系统的遏制。<sup>（4）</sup>

1968年8月，毛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清华大学。官方报纸宣布：工宣队的到达是工人阶级掌管教育的新时代的第一步，毛送给工宣队一篮子芒果作为个人赠礼，使得这个时刻更加神圣。派到清华的工人和解放军成了范本，类似的队伍也被派往全国各地审查指导学校工作。宣传队首要的任务是重建秩序，制止大学各派系组织的争斗，并创立新的领导集体。通过严厉的镇压所有潜在的反对者，工宣队树立了权威，他们在学校的八年里营造的不安气氛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这个队伍的成员们明白，他们承担了占领并改

造一个原先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学校的任务，这种认知加剧了他们的独裁作风。

由学生领导的两个对立派系随随便便就解除了。暗中维持派系联络的做法被制止，许多派系头目和积极分子受到审查和惩处。<sup>(5)</sup>经过一段规定的政治学习，大部分学生被送到军队农场，随后分配了固定工作，通常是在工厂。大学的教师和干部经受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费了更大的力气才过关。宣传队重新审查了教职员工和学校领导从1949年以前的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历史。清华大约6000员工中，1228人受到审查，178人被宣布为“阶级敌人”。根据半官方的校志，在运动最高峰的两个星期期间，10人被迫害致死。<sup>(6)</sup>在1969年，清华大部分领导、教师和员工被送往江西省农村的五七干校，直到1970年新一批学生到达他们才返回学校。

## 权力的分割

工宣队由两位年轻的军队干部迟群和谢静宜领导，他们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也是他激进的追随者。迟群曾在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8341部队担任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则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与毛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一开始，宣传队的庞大队伍包括5147名工厂工人和105名军队干部，但几个月以后人员大大减少。<sup>(7)</sup>绝大部分高层领导是军人，如迟、谢，不过有几个工人也担任了重要岗位。绝大多数工宣队成员是来自本地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们都在工厂里党领导的政治团体中有积极表现，其中多数是党员。除了最高层的几名领导之外，其他工宣队成员都轮流进校，然后返回自己原来的工厂或部队。他们在清华是帮助监督学校领导，而不是自己担任领导。

大多数校领导恢复了工作，工宣队给他们安排的职位与文革前大致相同，不过他们要在宣传队的监督下工作。<sup>(8)</sup>工宣队到达不久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管理大学，1966年各项职能已经停顿的学校党组织也于1970年由革委会重新建立起来。刘冰再次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文革前负责学术工作的何东昌恢复原职，不过正式的头衔是大学“教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把手的位置则保留给宣传队代表。<sup>(9)</sup>到1972年，作为学校权力核心的校

党委会由九名宣传队成员和八名清华的老干部组成。宣传队的领袖迟、谢分别担任书记和副书记。<sup>〔10〕</sup>

工宣队的领袖与中共的激进派结成紧密联盟，与此同时，包括刘冰和何东昌在内的学校老干部则与党内较为保守的领导结成紧密联盟。<sup>〔11〕</sup>尽管各级的分裂和联合错综复杂，党的激进、保守两个阵营的分化却也使得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充满活力。<sup>〔12〕</sup>一系列与文革相关的激进政策划定了派系间的战线。<sup>〔13〕</sup>激进派的生命与文革息息相关，他们热烈拥护文革纲领，而保守派努力遏制甚或颠覆文革方针。激进分子的领袖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垮台后被指责为“反革命”的“四人帮”），他们主要的支持者是文革早期涌现的地方激进派的残存者。邓小平成为公认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老干部。

迟群和谢静宜在全国性政治活动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0年，迟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小组的副主任，而谢成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并于1973年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sup>〔14〕</sup>迟、谢应邀列席代表国家权力核心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在文革后期帮助发起并领导了最重要的激进政治运动。他们越过常规的组织程序，直接向激进派领袖江青和张春桥汇报。

大学的老干部和清华的工宣队成员有各自不同的权力背景。一方面，老干部有文化和政治上的雄厚根基，属于国内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许多人在党内的地位都比半路出家的工宣队要高。不仅如此，清华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是他们建立了大学的党组织，而现在工宣队对党组织的领导是薄弱的。另一方面，由于宣传队成员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权力单单建立在政治资本的基础上，而且他们的政治资本具有文革的独特性。即使是宣传队的最高领袖，起初在党内的级别也并不高，与其说他们的政治权威源于在党内的地位，不如说是由于毛委任他们治理学校。

学校的一位高层领导麦清文回忆说：在那个时期，毛的权威远远胜过党组织的权威。当时造反派的攻击破坏了党的“威信”。

“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威信在文革早期一落千丈。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批判，无论批评的对不对，结论就是他们都是坏干部。腐败、贪污、乱搞男女关系——所有领导都不好。”

麦解释道：由于宣传队是毛派来的，它的权威超越了大学的党组织。

“工宣队利用了党组织，但是党本身没威信了。是工宣队领导党，而不是反过来。迟群首先是工宣队的领袖，然后才是党委书记。”

迟、谢想要紧紧地控制住学校的工作，但党组织的分裂状态妨害了他们实现这个意图。系统的决策机制、常规的命令下达链条和传统的升迁评级体系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瓦解了。此外，宣传队对于自己控制的清华党组织不完全信任，他们又建立了一套权力网络，使其凌驾于原来全能的党组织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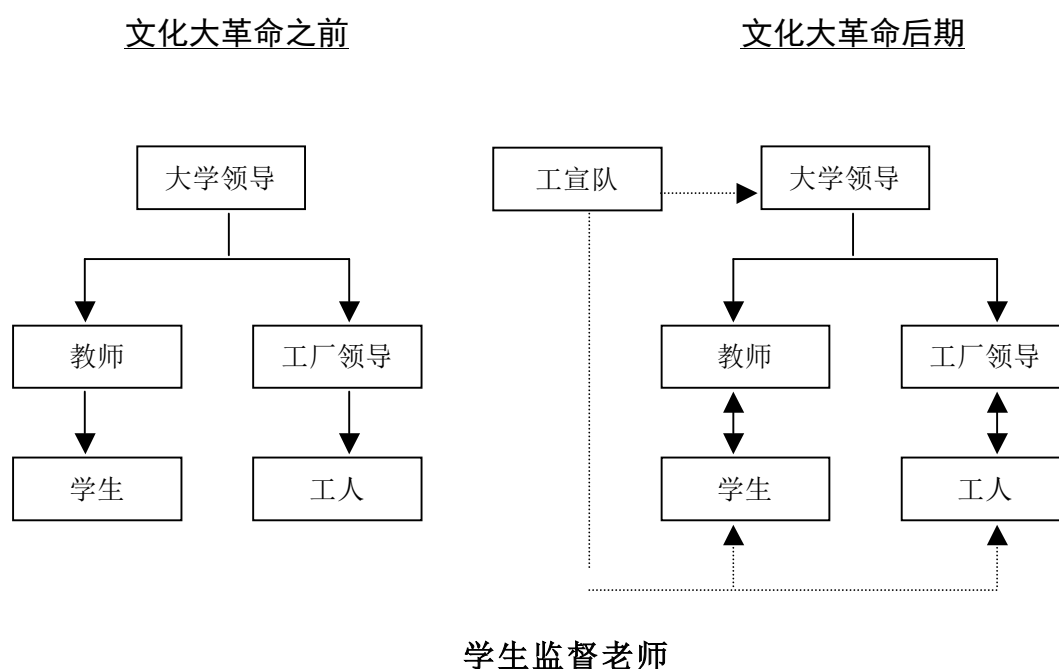
### 自上层和下层监督领导与教师

工宣队在校期间，清华的管理与以往大相径庭。在文革之前，蒋南翔担任领导，大学由高度服从纪律的党组织管理。蒋身兼党委书记和校长两职，他要求下级绝对忠诚，并在各级建立了围绕党委的有效的管理机构。这种权力等级制度是清晰的、单向的、由上而下的。处于底层的学生应当服从老师，校办工厂的工人则服从他们的领导。<sup>〔15〕</sup>在文革早期，这套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成为学生造反派的主要攻击目标。清华激进派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批评学校干部既有屈从性，又有压迫性。

“他们总是条条框框多，有奴隶主义；工作中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他们更在意遵守规则而不分辨是非对错。对上面的人唯唯诺诺，对下面实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压制不同意见。”<sup>〔16〕</sup>

在文革早期，学生造反派把蒋和其他共产党领导拖到主席台上，他们被自己的下级批判羞辱。<sup>〔17〕</sup>在文革的词汇中，这种来自下层对干部的批判被称为“群众监督”，旨在矫正领导把持权力的官僚作风。为了避免“官僚阶级”的出现，各工作单位的基层员工被授权去“监督”上级。工宣队到清华后，制止了文革早期粗暴混乱的“群众监督”，取而代之的是将约束官僚权力纳入规范的做法。1966年之前在清华实行的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制度，现在的体制则是工宣队从上面监督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与此同时发动学生和工人从下面批评他们。图1简单示意了清华监督制度的变化，与工宣队在校期间相对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治政策。

图 1：清华大学的监督制度



在文革后期，大学的教室中坐满了由工厂、农村公社、部队推荐来的学生。工宣队认为这些工农兵学员比起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他们大部分出自革命前上层社会的家庭）来在政治上更为可靠。按照当时的口号宣传，这些新学员不仅应当进入大学，还应当管理并改造大学。朱佑贤记得，在 1970 年清华欢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群众大会上，校领导告诉他和其他新学员说：“你们来自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队伍。清华是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你们必须要参与政治。”

为了让学生能参与管理他们所在的科系，学校变更了组织结构。文革前，学生和教师高度组织化，不过是分别管理的。学生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学习、娱乐、福利等），而教职员工负责教研工作。职工委员会（以及与其并列，掌握实权的党委）管理各系，职工“教学与研究小组”管理系内各专业。文革期间则大为不同，师生结合到同一机构，学生直接参与管理教学研究工作。

与文革前相同，一个班大约有 25 名学生，他们在校期间一同生活学习，不过现在每个班里还固定安排了一组老师。对学生和教师双方而言，班级都是基本的组织单位。同届同专业的班级组成“小型教研小组”，其中包括学生、教师和一名工宣队代表。每门专业由三个小型教研小组构成（每届一组）<sup>（18）</sup>。教工代表、学生和工宣队“三结合”的“教学改革小组”统一领导这种教研小组。同样由教师代表、学生和工宣队组成的“革委会”则管理各系（每系包括数门

专业)。近一半学生是党员，再加上师生通常属于同一党支部，这使得师生组织上的结合更为牢固。实际上，在一部分师生共属的党支部中是由学生担任领导的。

这种蜂窝结构无疑限制了学生选择导师及课程的范围，但却有利于学生参与决策。学生们加入到设计课程和解决教学难题的工作中，小型教学小组频繁会面，讨论学术、组织和政治事务。方学英和其他学员是这些小组中的积极分子，她说：“教师汇报后我们来讨论；有时我们否决整个报告，有时则认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学生对于教育改革热情高涨。我们会讨论自己的专业方向——说到底，我们要去训练什么人呢？”

这些讨论紧密围绕着中共最高层确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我们在会议上争论，贴大字报表达不同的意见。”<sup>(19)</sup> 老教师魏学诚回忆道：“不过一般都是附和中央定下的基本观点。”然而争论决非毫无意义。涉及到的教育方针问题是保守派和激进派论战的焦点，其中包括如何在工作地点实行“开门教育”，重点应放在基础理论抑或是实际应用的课程，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是否要把学生分为快慢班等等。结果是把师生双方均置于论战的前线，正是这样的论战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央的政策方针左右摇摆，此时一些人努力捍卫激进派或保守派的牢固地位，有些人则见风使舵，跟着占上风的一派走。方学英说，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锻炼了工农兵学员的写作、演讲和组织能力。

“我们要参与、管理、改革（上、管、改），要批判教师和旧的教育体制。我们每天晚上都开政治会议，讨论问题，写大字报……我们的业务知识比不上现在的学生，不过写作能力比他们强。”<sup>(20)</sup> 我们要写大字报，参与辩论并且演讲，所以我们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在小型教学小组讨论如何由上至下的落实教育政策时，一些学生不免对此做出最为激进的阐述，许多教师则发现自己在争论中处于维护传统教育方法的立场。教师们很容易被谴责为“穿新鞋，走老路”，所以他们在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他们提议采取温和的做法时更是如此。1970年在清华学习的青年农民罗贤成回忆道：“[当]我们开会争论教育问题时，学生和工宣队代表有话就直说，可教师却不这样——他们是改造的对象。这不是公平的讨论……

教师们更加谨慎——并不是他们不敢谈，不过他们比较小心翼翼。”

学生在过去常常屈从于教师，现在情况反过来了。老教师魏嘉陵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传统师生关系的一种有害的逆转。

“文革前，老师和学生是中国传统的教授和被教授的关系，这样非常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心学生。文革期间，情况就变了——老师成了监督的对象，学生成了学校的主人。”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下层对教师 and 大学干部提出批评成了平常事，但是这在过去是非同寻常的。老教师杨郁天注意到了这个差异：

“那个时候，[工宣队]要求学生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可不像[1957年]反右派运动。那时他们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但在工农兵学员这一段儿，他们不给别人戴上帽子。<sup>(21)</sup>不存在什么敌人——他们只是一般性的批评知识分子。这让你不舒服，说话得小心，可是他们不给你扣帽子。我们习惯受批评了。”

杨的话当然不能说明七十年代的政治压力是温和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不过从他的话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教师和领导来说，接受来自下层的批评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过去，这样的批评通常局限在批斗会范围内，批斗是只针对少数几个人的，而且预示着严重的后果。

按照传统，教师应当立身严谨，这样才能获得学生的尊敬。和学生开玩笑或者一起嘻嘻哈哈有损于教师的尊严和权威。文革期间，这些想法被批判为“师道尊严”，这个词是用于嘲笑当权者的孔夫子教条。一些学生乐于有机会贬低高高在上的老教授。龙江澄是水利系的一名外籍学生，他还记得张光斗教授每天都要接受审讯，这位教授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水利工程系，在1958年领导设计了大型密云水库。“学生曾对他很不好，”龙回忆道，“一个女生老是打他——她并不伤人，就是过去打他。”

在文革前，张曾是清华最有权威也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而现在他不得不在抵挡学生辱骂的时候保持良好的幽默感。“他们拿他取笑，他也反过来取笑他们。”龙补充说，“[不过]他没被打倒，而且学生们尊敬他。”<sup>(22)</sup>

尽管师生间生硬的权力逆转制造了紧张气氛，可一些学生和教师却说他们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亲密的关系。方学英于七十年代早期在清华上学，现在任教



于此，她把现在的师生关系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较。“那时老师的地位不如现在高一——说起来，那时学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诉我，“老师们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是在旧体制下训练出来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们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他们不像现在的老师那么有权威，不过师生关系更密切。”梁佑生 50 年代就读于清华，毕业后留校教书，他对比文革前与文革期间的师生关系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学生对老师非常尊敬；不过彼此等级分明——学生和老师是低层与高层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对老师也充满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级关系，而是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老师感情很深，也很亲。老师花费心血教导他们，他们真的是心存感激。”

文化大革命晚期，为了响应“开门办学”政策，师生到工厂一起生活工作，方、梁和其他人注意到，他们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尤为密切。“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和学生一起住，八个人一间。”梁回忆道，“我们分享一切；我们无所不谈。”

## 工人监督领导

在文革期间，清华校办工厂的管理体制也经历巨变。为了结合教学、研究和生产，清华和其他工程技术院校一样也建立了几家校办工厂；到七十年代早期为止有 1800 余人在工厂工作。<sup>(23)</sup>在 1966 年以前，基层工人已经结成小组，领导组织起车间的基本生产。因而工厂工人和学生一样是高度组织化的，不过在生产小组以外，他们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在文革前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名校工厂的管理干部洪承谦说：“文革前，工人是被管理的。文革一开始，工人成了主人。”有一段时间，学校党组织工作停顿，学生领导的派系忙于争夺学校的控制权，这个时候工人选出了临时委员会来管理校工厂。老工人陈金水讲到了清华设备工厂的情况：“我们工作单位的所有领导都被打倒了。包括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他告诉我，“我们选举出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四个工人和一个技术人员……领导集体不一样了——要是有人不好，我们就选别人。”

在那个时候，清华工厂的员工也分裂成对立的派系，可是派系路线并不是

决定选举的唯一因素。陈回忆说：“派系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是否信任那个人。他们是不是老实，有没有办事能力，和群众关系好不好。在一起工作几年了，很了解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

1968 年夏，清华的派系矛盾转变为武装冲突，工人们放弃了学校工厂。工宣队八月份接管学校后，组织了新的革委会来管理工厂，由宣传队代表担任领导。老的管理干部通常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不过包括一些曾被选入临时领导班子的工人在内的基层工人也进了革委会。即使在重新任命了老领导之后，工人对工厂事务仍然保留了实际的影响力。文革使得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我们批评管理干部]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陈回忆说，“我们批判官僚作风——如果你不懂，就应该虚心请教，不然事情办不成。”

作为曾被打倒的工厂领导，洪承谦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又当上了厂里的高层干部。洪在回想那段岁月时心里怀着矛盾的感情。“那时候工人们造反，要推翻管理规定——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朝着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他说，“工人们会说，‘你怎么一当上领导就不劳动了？’有了这种思想，形势变得很混乱。”

起初，许多事情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来决定。洪认为这不实际。“一百个人没法领导。”他原来经常举一个例子来向工人们解释这个问题，和我也讲了这个例子：“工宣队一到，就召开大会讨论工作时间的問題——早上几点上班，中午几点休息，晚上几点下班。所有人都开会整天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做不出任何决定。难处在于有人在学校住，有人在市区住，有人单身，有人带小孩——大家的意见五花八门。最后，他们没法决定，还是按照学校的规定来。”

大会的人数逐步减少。洪说：“会议变得比较有规矩了。说老实话，工人其实对开会没兴趣。”尽管工人对于群众大会的热情降温，他们还是继续在管理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车间派出三名代表参加会议，协调不同车间的生产任务。

“所有事情都得和工人讨论。他们对讨论生产很有热情。当然了，接着就是要批判知识分子，工人们就干这个。通常的说法是：‘知识分子在纸上画条线倒容易，他们不考虑工人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基层工人被提拔到车间和工厂的领导班子里，同时也进入各系的领导班子（在那个时期，校工厂在行政上与相关的科系结合）。实际上，有些普通工人在全校各级领导班子里都占据位置。

把基层工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政策被称为“掺沙子”，意为加入沙子以打散坚硬的泥土。一方面，这个比喻是指让工人、农民加入知识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这两者之间存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异。按照同样的原则，基层教师也被提拔到清华的主要领导集体中。这种做法是要让非领导成员介入领导集体——他们之间存在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差异。两种做法互有交叉，指导思想都是通过引入外界因素来瓦解铁板一块的领导班子。

#### 注释：

\* 作者注：本文的研究得到了 Fulbright-Hays, Spencer Foundation 和 Peking University Fellowships 的支持，以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学会各位同仁的帮助。同时感谢那些不吝于花费时间告诉我他们故事的清华人。Rogers Brubaker, Mick Mann, 唐少杰，丛小平，王超华，Margaret Kuo, Steve Day, Wu Shengqing, Eileen Cheng, Elizabeth Van der Ven, Paul Pickowicz, Joel Esherick, Andrew Walder, 苏杨，Bill Rowe, Tobie Meyer-Fong, Kellee Tsai, Andrew Kipnis, 以及 The China Journal 两位不知名的读者都给了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THE CHINA JOURNAL, No. 55, 2006 年 1 月

1.在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九个委员中的四个人均为清华毕业生，其中包括现在的胡锦涛总书记。分析清华毕业生的权力地位，可参看 Cheng Li :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1) 。

2.我访问了清华大学的 89 个人——有学生、教师、职员、工人或领导——工宣队在校期间（1968-76）他们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学校。访问时间由 1998 至 2001。本文中被访者均为匿名。我也研究了当时的档案，包括大学报纸和领导报告，个人回忆，官方和半官方的校志，以及统计公报。要更多了解我的研究方法，请参看 Joel Andreas, Dismantling and Rebuilding Class: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3。

3.激进的井冈山派系起初抵制解除武装，派去镇压学校派系的五个工人被杀。了解清华大学派系斗争的情况，参看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1(2002), pp. 463-519; William Hinton(韩丁),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以及唐少杰, 一叶知秋: 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香港: 中国大学出版社, 2003)。

4.在许多地区, 这一段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 由于激进组织抵制解散, 军队和地方党领导以粗暴的方式重申他们的权威。参看 Andrew Walder 和苏杨,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75-99。

5.对于原来的积极分子而言, 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 1971 年对“5.16”的长期审查, 这次审查直接指向原来激进派的成员。清华的审查在一名学生自杀后戛然而止。

6.刘克选和方明东(主编), 北大与清华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p.621.该数字包括了自杀者以及由于审查引起的压力, 造成健康问题恶化而去世的人。

7.贺崇铃(主编), 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pp.274-75。

8.大学的党委书记蒋南翔情况尤其特殊。他在文革前已经担任高教部部长。在清华的校工厂工作了几年; 邓小平 1978 年上台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9. 刘冰, 风雨岁月: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10.刘克选和方明东, 北大与清华, p.129。

11.激进派在全国占据优势的时候, 工宣队也在清华居支配地位, 而当保守派在全国占据优势时, 学校的老领导力量则上升。然而宣传队和老干部双方在政治上都并不是始终一致的——有些老干部与宣传队领导结盟, 而许多宣传队领导最终倒向大学的老干部一边。

12.在文革十年的早期阶段, 派系冲突错综复杂, 这种混乱状况使林彪和其他军官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且他们既不投入激进派阵营也不投入保守阵营。林彪 1971 年 9 月葬身火海后, 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分化愈加明显。

13.文革纲领确定了 1966-76 十年的政治日程。由于激进派对此热烈拥护而保守派持反对态度, 所以提到该纲领时使用“激进”和“保守”这两个词是恰如其分的。

14.参看 Ding Shu, “进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译电员”,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通讯, 第 65 期, ([www.cnd.org/CR/ZK00/zk210.hz8.html](http://www.cnd.org/CR/ZK00/zk210.hz8.html)), 2006 年 1 月 12 日; 以及贺崇铃, 清华九十年, pp.279, 284。

15.和其他工程技术学校一样, 清华以结合教学、研究和生产为目的, 也建了一批工厂。

- 16.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兵团印发），1967年4月18日，p.2。
- 17.在群众大会上批判羞辱共产党干部一直是过去“开门”整党的特色，不过批判是由党的机构组织的。对于内战中这种事件的生动描述，可参看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纽约：Vintage Book,1966）。
- 18.文革期间的大学教育一般缩减为三年。
- 19.大字报由个人或小组撰写，贴在公共场所，是 1957 年以来在中国发表政治论述的一种重要形式。
- 20.在此期间，清华的学生不仅从事政治活动，也刻苦学习工程技术的实际知识，但是几乎不学习抽象理论。而且由于许多工农兵学员并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在清华的三年学习中，更为复杂的科学和工程课程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掌握，而这些课程在文革前都是要教授的。激进派更为关注的是避免精英主义而非训练合格的工程师。
- 21.“戴上帽子”意为使人成为批判对象，给他贴上诸如“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知识权威”或者“走资派”之类的标签。
- 22.译注，鉴于张教授在学术上的实际表现，文革以后张的形象，未必如朝野尊重的那么神圣，特别与黄万里教授相比。
- 23.李鸿儒和 Jiang Xihua,“清华大学校办产业发展初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一期（1994），pp.82-87。
- 

## 【风云人物】

# 肖力在中央文革

王广宇

## 一、江青不让肖力坐办公室

肖力（李讷）是 1966 年 7 月初来钓鱼台的，那时中央文革办公室刚刚成立，江青让穆欣给肖力在办公室安排工作。穆欣同我商量，我们觉得当时文电组杂事太多，收发文件，接电话，跑腿，这些工作对肖力不太合适。恰恰在此时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增多，办事组的人忙不过来，另外这个工作是坐办公室看信，不必东跑西颠地干杂事，对肖力这样的女同志比较合适。这样，就决定让肖力办信，主要办陈伯达的信。

肖力是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她办信的时间不长。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七楼放映室看电影。电影开映前，小组成员陆续到场，江青看见穆欣后，马上阴阳怪气地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天天坐在办公室办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不让她出去见见世面，怎么锻炼她呀？为什么不让她出去闯闯啊！穆欣回答说：办公室现在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给肖力，我们暂时先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没有固定她的工作。说这番话时，小组成员和肖力都在场。

此后，肖力作为办公室的特殊工作人员，时来时走，来去自由。那时正是文革初期，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正在“造反”，肖力主要出入于北京各个高等学校，她的活动当然不需要向穆欣汇报。

## 二、找肖力回家是直接为毛主席服务

江青不同意肖力坐办公室办信提出不久，办公室对肖力的行踪就很难掌握了，她来去很少给办公室打招呼。办公室也不便问她的去向，这样，她家有时有事找她，就很难找，因为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有一天下午六点左右，戚本禹把我叫去，对我说，毛主席想见肖力了，要她今晚回中南海家。现在还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晚上她也不一定回中南海。她不回去毛主席会着急的。你知道吗？毛主席是最喜欢他这个小女儿的。戚本禹对我说：你马上出去想办法把她找回来。我说，她去哪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戚本禹说，要千方百计地找，比如各高校红卫兵总部，造反派活动的场所。正因为有困难才让你去想办法。戚本禹见我面有难色，便严肃地说：你不要小看这种小事，这样跑腿的事，别人想去我还信不过他呢！这是直接为毛主席服务的工作，你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今晚想轻松一下，和小女儿团聚，如果见不到，那该多么扫兴啊！我觉得你这人忠诚老实，才把这个差事交给你，这事都是保密的，不要告诉别人，你一个人去办就行了，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戚本禹这番话我觉得有理。回来我开始打电话了解肖力可能去的地方，集中找高等学校，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找到。最后，我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前一段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要求和何长工谈判，静坐数日没有结果，不妨去那里看看。于是我要车直奔地质部，去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

。我所以想去找朱成昭，是此前肖力曾同我说起地质学院学生的绝食斗争，学生那种执着劲挺可怜的，没人理。肖力有可能又去地质部看。

那天是我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因为总政发给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十几套军装，把红领章都装在上衣兜里。我急着外出穿上军装后，没有把领章别上。结果惹出了令我非常难堪的麻烦。

我去地质部找朱成昭，当然是保密的，此时，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由在院子静坐绝食，转为冲进了地质部办公大楼占领了一层楼。而地质部还没瘫痪，地质部的原领导还在坚持工作，传达室和收发室仍然在正常工作，但地质部和学生对立气氛很浓，我以解放军记者的身份进地质部大楼时，传达室并没阻止我。在地质部大楼一楼，由一位学生引导穿过了几个房间，左拐右拐找到了朱成昭。其他办公室都住满了学生，朱成昭住个小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同朱成昭见面，我要单独同他谈，他叫几个同他商量事的人出去后，我向他亮明了真实身份。我们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肖力是否来过？朱成昭对我说，肖力同他谈了一下午，晚饭前走了。我问朱成昭肖力去哪儿了，他说，回家了，可能回中南海了。

我找到朱成昭距肖力离开地质部不过一两个小时。虽然有了肖力行踪的线索，但她是否真的回中南海还难以肯定，我必须继续追踪。我在朱成昭那里坐了不到十分钟便告辞，从大楼出来，刚要出地质部的大门，麻烦来了。

在大门口，我被一位身穿半旧毛料中山装、高个、微胖、约五十多岁的老头拦住了。这位看似地质部的一个负责干部，对我毫不客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记者证拿出来！”我说：“忘记带了，”“你没有证件，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到底来干什么？”我说，“找个人。”他问：“找谁？”我说：“没有必要告诉你！”他说：“我们是国家机关，你进来找人为什么不登记填会客单？”我说：“我就停一会，你们也没有拦我。”老头说，“我早就注意你了，你的行踪可疑。你看你穿的军装为什么没有领章？有帽徽，没领章，谁知道你这解放军记者是真是假？门口停的小车是你坐的吧？”我说“是。”他说，“你解放军的车怎么不是军车牌？”我说：“解放军也可以乘地方的车呀！”老头强硬地说：“你不能走，必须说清楚。”我告诉他我有急事。他说：“不能证明你的身份，我不放你走！”我说：

“我到传达室打个电话同单位联系一下可以吧！”他同意了。我给办公室打了电话说，叫中央文革办公室开个证明我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信，我现在被扣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因为他知道中央文革是支持地质学院东方红冲击大楼的。

僵持了十多分钟，办公室还没来人，从钓鱼台到地质部没有多远的路。我着急，便叫随我去的司机回钓鱼台，催办公室快拿证明信来。司机走后，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办公室的胡光明拿着信来接我。胡光明也穿了一身崭新军装，他把信先给我看了一眼，信中说：王广宇同志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他有要事去地质部。见信后，请放行。证明信署名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盖上刚刚起用的图章，老头看过信后，未再刁难，便让我走了。在地质部我被扣了约一个多小时。

回钓鱼台后，我见了戚本禹，告诉他，朱成昭说肖力今晚可能回中南海，戚本禹说：“知道了，我们已经给她家打了电话说已经回去了。”然后我说：“我在地质部被扣了一两个小时。”戚说：“你怕什么？最好他把你送到公安局去，那就好办了。”

过了不久，一天中午，江青心血来潮要见肖力，戚本禹又派我去想办法找。肖力的行踪虽然难以掌握，但她同我们共过一段事，大致可以猜测出大的方向。我了解肖力最近主要是同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有接触。于是我就同司机贾德祥一起开车直奔首都三司进驻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大殿。

劳动人民文化宫文革后已经开放，公园里到处都是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无论是大树下，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周围以及林荫小道，都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的红卫兵在交谈。偌大的公园这么多红卫兵一团一伙的，怎么找法？我同贾德祥商量，我俩分头从西门出发，贾德祥从西转南向东，我从西转北向东，我用了十多分钟，转到东边，毫无所获，没发现伊人的身影。我只好回西门停放汽车处等候贾德祥。等了一会儿，我蓦然一转头，却发现贾德祥和肖力一起走了过来。我对肖力说：“你母亲有事叫你回去。”肖力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我们乘车进了钓鱼台东门时，肖力坐在副驾驶位子上，不满地自言自语说：“干嘛！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我解释说：“是你母亲找你有事！”停了一会儿肖力回过头来又说：“老王！这事不怪你！”



### 三、肖力破例转为正式党员

肖力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65 年毕业后，直接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四清”工作团，到农村搞了一年“四清”。1966 年 7 月初，她结束了农村“四清”工作来到钓鱼台，住进钓鱼台十一楼，同我们办公室的同志吃住一起。

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谁，她一副村姑打扮，短发，穿了一身旧蓝布衣服，脚穿解放鞋，风尘仆仆。第二天，吃完晚饭后，我问办公室调查组的何天齐，那位同我们同桌吃饭的姑娘是谁？何天齐惊讶地说：“你不认识她？”我说：“不认识。”何天齐告诉我，她乃毛主席小女儿李讷是也！现改名肖力。

在十一楼住了几天，办公室就搬到十六楼，肖力被分配到办公室文电组工作，穆欣让我帮肖力找点适合的工作，才把她介绍给我。我安排肖力先办陈伯达的信，并向她说明办信的程序和要求，我一次给她三四十封信，她居然在两三天内，圆满地完成任务。从填写的每封信的来信摘要和处理意见看，她是认真阅读，精心摘要，能抓住每封信的主要内容，文笔流畅，字也工整漂亮。在办信组的几个同志中，她办信的质量最高。她很虚心。开始，她还坐得住。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她的接触逐渐多起来，有时，有接待上访的任务或出去了解情况，我俩一起去办。本来我们办公室听取上访人意见是在联合接待室（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联合接待室，设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楼内），是可以要车去的，但有两次我同她一起去联合接待室，她主动提出坐电车去，坐电车要自掏腰包，无处报销。有一次去北京财金学院也是坐公交车出去的。她生活很简朴，如那次在联合接待室接见上访者，谈完后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回钓鱼台也过了开饭时间，我们就到联合接待室食堂就餐，虽然也过了开饭时间，我们同炊事员说明情况后，我俩一个人买了两个馒头，只有剩菜，我要了一个两角钱的菜，肖力只吃一角钱的菜。

她穿着也很朴素，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期间，她部是穿普通蓝布衣服，圆口布鞋，偶尔也穿双皮鞋。夏天，她穿的黑色裙子，她告诉我那都是她用她妈妈的旧裙子改的。总之，在我同肖力共事这一段，看不出高干子女那种盛气凌人的骄娇二气。

1966 年 7 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党支部成立。这个支部当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就二十多个党员。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建立支部后第

一件事情就是讨论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按当时中央发的关于文化革命期间暂停发展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的通知，支部本来是不能讨论的，但因为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只有她一个是预备党员。鉴于她预备期已满，工作又需要，作为特殊情况，经有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研究决定，还是讨论她的转正问题。大约在7月末的一个晚上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肖力转正问题，参加支部大会的有部分小组成员，我记得有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几个人，办公室的全体党员。支部大会由我（组织委员）主持，支部书记范恭俭宣读了中组部“四清”工作团党组织关于肖力同志在农村四清中的表现，认为肖力在预备期间表现良好，具备正式党员条件的书面意见。与会同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肖力转为正式党员。全体党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支部会将支部大会同意肖力转为正式党员的意见送中央办公厅党委批准。

#### 四、肖力对“三门干部”提出意见

肖力在办公室工作初期，同我接触比较多，她有时也谈谈她对办公室工作的看法。记得她看到办公室陆续调来一批年轻人，都集中在十六楼办公、吃住，觉得有些乱。有一次，她向我了解办公室年轻的同志都是从哪些单位调来的？都是什么情况，我告诉她，这些同志都是从中直机关来的，主要是从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红旗杂志社和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中央单位来的。我们要求调人的条件，政治立场坚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开始后表现好的。特别强调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清楚。这些工作人员中，除了几个人是十七级以上干部外，绝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经过选送单位严格审查后调来的，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是经过我们文革小组审查后调进的。部队来的同志是经总政治部干部部审查的。

肖力对我讲：这么多年轻大学生，没有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三门干部”，就调到办公室工作，而且在钓鱼台这样生活条件优裕的地方工作，对他们锻炼成长很不利。在政治上也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考验，到中央文革来了就进了“红色保险箱”，成了当然的左派，他们很容易飘飘然。

对肖力的这种议论，我作为工作人员、同事，只能姑妄听之，改变这种状况，要由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来做决定。我没有把肖力的意见向上反映。

## 五、中央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及其引发的风波

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小会议室外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用十六开白纸写的小字报。小字报的作者就是肖力。肖力的小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上上下下的注意和重视。小字报字数不多，简明而尖锐，矛头是对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我记得大致内容是：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工作没有章法，工作人员虽然辛辛苦苦，却整天忙忙乱乱，工作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很少过问。年轻的工作人员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环境里，如同在“红色保险箱”里，这对他们培养锻炼也很不利。办公室的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否则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两位主管办公室的小组成员在肖力的小字报边上写上“接受批评，努力改进”之类表态，但都没署名。

这份小字报在钓鱼台十六楼贴出后，得到了部分工作人员的响应，其中有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司机最为积极。他们把小字报提升为大字报，贴到了小组成员开会必经的值班室和小会议室外边的墙面上。内容无非都是响应肖力号召，批评办公室工作无章法，工作人员陷于事务主义，不问政治，养尊处优之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起火，而放火者竟然是肖力，谁敢来扑灭这“革命烈火”？

正当这个“星星之火”即将酿成燎原之势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制止了火势蔓延。这是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

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响应肖力的号召，向办公室负责人开炮，并把肖力小字报批评的现象，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大字报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内同样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理论家如姚×、范××、许××这些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大字报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最后说：要“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如何如何。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胡××、雷××。两位都是196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一年多“四清”，文化革命开始后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他们毕业后分别分配到《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还没有来得及做业务工作，是地地道道的“三门”干部。他们的大字报是上纲最高，措词最尖锐的一张。许

多工作人员担心，在中央文革内部将要像社会上一样搞起运动。然而工作人员大都忽略了“以陶铸同志为首”的提法。

在钓鱼台十六楼，在一两天内贴出有数的几张大字报。出现了胡××、雷××的大字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来说话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出面宣布：在我们中央文革内部，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家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小组成员反映，也可以写书面意见给小组的领导。中央文革办公室需要正常办公，不能把这里也搞乱了。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关心大字报的内容。他们议论起小胡等大字报中的“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提法。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因受江青的排挤，已很少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成了陶铸为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小组的领导是谁？真是怪事！由此大字报而引到对小胡其人的议论。许多小组成员不了解小胡到底是负什么责任的，因为小组成员中，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外，小胡都以他个人名义批过文件给他们。小组成员还说，《文化革命简报》这样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刊物，也经由他批发。小组成员认为小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中转站”，提出是谁设立的“中转站”？需要这样的“中转站”吗？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销这个“中转站”，并认为小胡不适于在钓鱼台工作，调出去。小胡原是戚本禹调到中央文革来的。可能考虑到小胡年轻，戚本禹从中做了些解释和保护，文革小组没有继续追究他，把他调到花园村办信组工作去了，从而平息了这场由大字报引起的风波。

就“中转站”的问题，设“中转站”和办公室领导无关。我向有关小组成员作了交代和解释，并承担了责任。事情是这样的：

开始时，小胡在办公室值班室干些接电话，跑腿的事，参加值班室值夜班。是把他当成骨干来使用的，在众多大学生中，他工作积极肯干，主动负责，能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1966年9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又恢复了穆欣的小组成员活动，但他没有时间管办公室的那么多事。《文化革命简报》审稿权利下放到记者站后，记者站负责人为了慎重，还是把《文化革命简报》清样送办公室，请穆欣看。穆欣没时间，就把这个差事交给我，让我看，发现重大问题，再找他商量。我看了几期，因值班室的杂事太多，实在坐不下来看稿子。于是

我就想抽出一位同志摆脱杂事，集中精力专门处理这些文件和稿件，办公室值班室大部人是机要秘书出身，不适于看稿子，小胡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文化程度较高，可以处理一些文件文书。我同他商量，把他调出值班室，专门处理文字文件方面的事，为了让他摆脱值班室的杂事，我把他安排到十六楼二楼空着的小会议室去办公。还嘱咐他：记者站送来的《文化革命简报》清样审稿，原来是送穆欣审的，他顾不过来，所以抽出你专门看稿子，以后各组送来的电话记录、电报、文件、你认为需要发简报或打印的，请示穆欣后再办。小胡接手这项工作后，开始还同穆欣商量，时间长了，穆欣事情多，好多事情小胡就自己做主处理了。他批给小组成员的信件、文件，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所谓的“中转站”就是这样形成的。

## 六、肖力说我是“老好人”

大约 1966 年 9 月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开会，小组成员也都不在，在十六楼值班室的事也少了点，我们值班室的人有矫玉山、李奎林，还有一两个人，肖力也在场同我们聊天。不知什么原因，肖力把话锋转到了我身上。肖力盘问我从哪个学校毕业，都在什么单位工作过，家庭人口多少，妻子在哪儿工作，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一连串问题，我都如实地一一回答。我边回答边想：肖力怎么在众人面前审查我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

这时，李奎林半开玩笑地说：“肖力怎么审查起我们老王的历史了？看老王都有些紧张了。”肖力这时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笑了笑说：“老王，是个‘老好人’。”“老好人”这个词，按传统的理解，它的含义不是坏人，但也不算坚定的革命派，是一种不坚持原则，谁都不得罪的人，似乎是贬词。这个评价，出自肖力之口，当然有一定分量。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是：脾气随和，待人厚道，不得罪人的人。这样理解也只能算中性词。

## 七、外出串连回来调到解放军报社

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信时间不长，以后她就独来独往，自由活动。她外出主要是跑北京的高等学校，同各高校的造反派头头接触。由于她的年龄、举止和装束仍然像个大学生的，更便于了解情况。因此，她对北京高校的运动情

况、各派的观点比较熟悉。

大约在 1966 年 10 月至 11 月，肖力突然不再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照面了。11 月的一天，她回了钓鱼台，一身土气，短发扎着一根红头绳，穿了一身学生装，显得很疲惫。我对她说好久不见了。她告诉我，她同北京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外地串连去了。

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前，肖力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调离中央文革时，戚本禹向我交代，肖力到解放军报后，还要回来看文件，凡是我们能看的都可以让她看。肖力刚到解放军报那一段，隔三差五地还回来看文件，了解一些情况。后来在解放军报“造反”夺权后，回钓鱼台的次数就少了。不过肖力每次回来，碰见我还是打招呼的，有时也聊上几句。

## 八、肖力和谭厚兰“互不认识”

肖力调到解放军报社后，她到钓鱼台的次数也少了，即便来也是来去匆匆。直到 1967 年“七二〇”武汉事件后，7 月 25 日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凯旋归来。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大会，从林彪到所有未被打倒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次是我到中央文革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中办和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名单把我列入其中的。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中，北京高等学校的五大领袖不必说了，还有北京市革委会各组成员和一部分外地来京串连的著名造反派头头。

在开会前，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肖力，因为好久不见，我俩就随便聊起来。正在肖力同我聊的时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突然出现在我俩的面前，谭厚兰面对我提出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难题。当谭厚兰跟我说话时，肖力还没离开，我小声问肖力：你们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一下。肖力摆摆手示意不必了，随后就离开了。谭厚兰向我提出，外地一个造反派头头现在在北京，是个坚定的革命派，这次登城楼，没有他的名字，谭厚兰认为他应当上天安门城楼。我告诉谭厚兰，外地红卫兵头头登城楼的名单不是我们定的，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出于负责，我带谭厚兰去找正在城楼值勤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我向杨德中反映了谭厚兰的要求。杨德中说：今天登上城楼的名单是

中办和中央文革定的。要临时增加人，必须经汪东兴和戚本禹两个人批准，别人无权批准登城楼。谭厚兰不死心，又找戚本禹磨去了。

肖力和大名鼎鼎的北师大造反派头谭厚兰互不相识？我觉得有点奇怪，可是两人见面却如同陌生人。这里边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我猜不透。最近我看过一位叫师东兵写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的书，书中说，肖力在文化革命初期曾以“成都档案馆机要员”的身份找过谭厚兰，同谭厚兰谈什么材料的事，谭厚兰给肖力看了许多秘密材料，后来“机要员”突然失踪，材料也带走了。该书作者绘声绘色地描述“机要员”如何同谭厚兰巧妙周旋，谭厚兰竟不知道她是毛主席女儿肖力。这个事，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如果师东兵说的情况属实，那么就可以作为肖力和谭厚兰“互不相识”的注脚了。

---

### 【蓦然回首】

按：1957年四川省文联《星星》诗刊因发表诗《吻》和《草木篇》遭到批判后，又被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罗织罪名打出一个“反党小集团”，时任执行编辑的石天河因不服诬陷据理力争而被打成“极右派”、“反革命”，判刑15年。在四川雷马屏（雷波、马边、屏山一带的简称）劳改农场迎来了文革风暴。这段回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出文革大动乱那荒诞、恐怖的一面……

## 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

石天河

文革期间，我所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从西宁来冲击集训队监狱的那一回。时间我记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间。那是差点造成流血惨剧的事件，我们离鬼门关只有四十步，只在一挥手之间。我现在想起那件事，虽然不是心有余悸，也总觉得那天实在是太危险也太侥幸了。

文革的造反，因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开党委闹革命”，各

个不同单位各闹各的，原本互不干预。可是后来，闹派性的武斗开始以后，情况就越来越乱。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于是便有造反派冲击监狱的事件发生。口号是要“打开监狱解放造反左派”。实际上，雷马屏农场的这个监狱，那时还没有关押过造反派，本来并不是他们要冲击的对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乱症还传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说某某地方冲击了监狱，一切造反派都会闻风而动。雷马屏地区有一个森工局，林业工人很多。他们的造反派夺权以后，在西宁的声势，是比雷马屏农场造反派更大的。不知是为了“派性”还是为了“比声势”，他们忽然说要来冲击监狱。

农场的武警，在西宁共有一个营，但负责守护集训队监狱的，只有一个加强排，由一位副连长指挥。在听到森工局造反派要来冲击监狱的消息后，集训队的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武警在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对付“冲击”的演习，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隔着监狱的围墙，站在高板凳上，把枪口从围墙上瞄准监狱门前的那条路，作得非常认真。集训队的干部在武警演习时，就把犯人都集合到学习室，不许随便走动。犯人对这次演习，大部分是漠然无动于衷的，把它看作“假过场”，估量不会真有人来冲击监狱。而有过战争经验的犯人则嗤之以鼻，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守护监狱，只能吓吓外行，如果真有懂军事的人来进攻，这一排人便会被全部歼灭。因为，只要用几个手榴弹甩进来，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无法躲的。

大概这一次演习过后，武警和集训队干部也感到了在有人冲击监狱时，如何安置犯人确实是个难题，万一犯人从武警后面搞暴动，里应外合，岂不糟糕？于是，在这一天得到了造反派真要来冲击监狱的确切信息以后，集训队的周中队长，就决定把犯人分成几部分：一大部分，约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带领，到离队部不远的后边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较老弱的约二十来人，则由一位分队长带领，到队部前面向右拐弯处一块比较隐蔽的地里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动的不能劳动的病号，则让他们留在宿舍里，不准外出。

出工的时候，犯人并不知道会有人来冲击监狱，只以为是照常出工。带队的周中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农场工作有年，比较讲政策，平日作风稳重，对犯人不轻易打骂。他带队，犯人并不特别怕。只是，他平常是不带队出工的，今天忽然由他带队，而且，像这样分途出工，也不同于集训队的常规



。犯人对时局敏感的人，心里不能不有些犯疑：是不是今天有特殊情况？…  
…

我跟着这七八十人去改田改土，由队部下面的一条山路向左拐上坡。押送我们出工的武警，是四个人，三个扛着上刺刀的步枪，一个扛着一挺轻机枪。到工地以后，周中队长粗略地分了一下工，把人分成两部分，分别在挨着的两块地里干。那时候，劳改队里“学大寨”式的改田改土，本来是比较重的劳动，可是在集训队，它只有那么一点地，这两块地，就是把那个小山坡挖高填低，用挖出来的石头砌地边上的坎子，每块还不到一亩。队上似乎并不打算赶工完成，干部也并不规定每个人的劳动定额，犯人“慢工出细活”式地干，断断续续干了三个多月还是个毛坯子的样子。这天分工以后，每块地里有三四十人，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力气大的抬石头，手脚麻利的砍边荒，一边干一边就咕咕哝哝地在聊闲天。自然也免不了要猜猜今天这是个啥阵仗。因为，平日出工是没有机枪跟着走的。

大家耍耍搭搭地干着，到上午十点种的光景，忽然听到监狱里面传来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那哨音吹得特别急特别响亮，我们知道，这肯定是有情况了。忽然武警的那位营长匆匆忙忙地从坡下面走上来，跟周中队长咬耳朵式的说了几句话。这位营长，平时在集训队是很难得见到他的，他显然是今天才从西宁总场部赶来的。他匆匆忙忙跟周中队长咬了下耳朵就雷急火急地走了。周中队长马上就叫：“集合！”并且叫大家：“不带工具！都到这边来！”大家站成横队，清点人数以后，周中队长便把队伍带到工地旁边不远的一个小山洼，指着这小山洼向大家说：“你们都在这里挨在一起坐下！警卫站的地方就是警戒线！不许离开！不许乱动！”于是，大家就挨挨挤挤地坐到这小山洼的地上。

这小山洼是个撮箕形，背后是壁陡的坡，有一人多高，前面是个敞口，两边的“撮箕边”有点像隆起来的埂子，又像是两只巨人的手臂，把这块地搂成一个山洼。山洼里面杂草乱石高低不平，这七八十人零零乱乱地坐下去，刚好把它填满。“撮箕口”就挨着我们来的时候走的那条山路。我坐在靠右边埂子的中间，地势较高，没有树木遮拦，可以看得很远。通向监狱的那条公路，看得非常清楚。

三个背步枪的武警，有两个在左右两边的埂子外面走来走去，另一个背着枪走动在后面的坡上，他们离犯人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轻机枪就架在小山洼的正前方，离我们约有四十步的样子。机枪手是个近两米高的北方大汉，笔挺地站在机枪后面，一步不动。机枪的弹盒是上好了的。他眼叮叮地就看着我们，那样子有点叫人不寒而栗。

这时候，小山洼里的气氛是闷沉沉的，几乎能使人窒息。周中队长忽而跑下去，忽而又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几十分钟，忽然那位营长满头大汗地走上来，揭下军帽当扇子扇着，气喘吁吁地向周中队长说：“这事情恐怕是要干啦……”周中队长连忙走拢去和他低声地交换意见。营长只说了几句话，手一招，向站在坡上的那个武警战士叫了声：“你来！”随即拉着周中队长，带着那个武警战士一路走了。这时，小山洼这里，就只剩下了两个背枪的武警和一挺轻机枪、一个机枪手，在看住这七八十个犯人。

我发现小山洼里已经有了些交头接耳的小活动，回过头来，忽然看到远处通向监狱的公路上，有解放牌的大卡车在呜呜地开上来，车上站了满满的一车人。后面究竟还有几辆这样的车，看不清楚。这时，忽然有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说了声“接个火”。我转头一看，是“熊笨三”。他一面掏出纸烟在我的叶子烟上接火，一面低声说：“今天，他们可能是要用机枪点名，我们有几拨人准备抢枪。大家要我来问你，干不干得？”（他们之所以问我，是因为当时集训队的很多犯人，都把我看作是他们的“信得过”的“右派”。）我问：“有哪些人？”“熊笨三”说了几个名字，这些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他说：“×××那里有三个，×××那里有六个，我这边一共有十几个，还有的在联系，反正干起来大家都会动。”我问：“锄头钢钎都在工地上怎么去拿？”他说：“砍刀他们悄悄带过来了，石头都准备好了。警卫只有三个人，空手都可以对付。”我心里一阵紧，知道这些犯人是信得过我才来问我，他们也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必须由我来作决定。我连忙镇静下来，向“熊笨三”说：“你去跟大家讲，叫他们把人集中在前面两边的两只角上，不要慌，看着我手上的这杆烟，我一甩烟头，大家就动手。我没有甩，就不许动。你看，两个警卫的枪还是背着的，机枪的弹盒虽然上起了，但他俯身下去，打开保险，总还要十几秒钟，

他一俯身，大家就涌上去，还来得及。一定要看我甩烟头才一齐动手，这关系大家的生死，不许冒险。”“熊笨三”梭（注：方言，“溜”之意。）开去了。

一会儿，“段虾儿”又悄悄梭到我身边，说：“周老师，今天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对我们下毒手，反正是死，大家准备抢了枪跟造反派一起走，要不就在这些山上打游击，希望你来拿个主张，看怎么办？”我只好把向“熊笨三”说的话，又向他说了一遍，并再三叮嘱他，要看我甩不甩烟头，不到必须动手的时候，不要乱动。

我右手擎着这杆叶子烟，眼睛直盯着远处的那条公路，时而又向机枪手那里瞥上一眼，精神是极度紧张的。也许是过去的生活把我锤炼成了这样一个亡命的性格，越是在紧张的时候，我越能沉着。

一会儿，我看到武警战士大约有一班人，从监狱里涌出来向公路上跑去，手里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面跑，一面把“红宝书”举在头上挥舞。很明显，这些动作是从报上学来的。早些时候的报上，时常有解放军战士举着“红宝书”去隔断“武斗”火线的报道。看看他们已经挨近了迎面而来的造反派的卡车，……看来卡车似乎停住了，……造反派并没有下车，……卡车似乎在掉头，……情势显然缓和了……我仍然眼叮叮地望着。

又过了好一会，周中队长走上来，喊大家“集合”，然后叫到工地上把工具拿回来，收工回队。这时候，我手上的这杆叶子烟，已经快烧到我的手指头，到站队的时候，我才轻松下来，吁一口长气，把烟头甩了。

回到集训队，在学习室里坐下来，想起刚才的事，心里反而怦怦地跳。这太危险了！如果我在那恐怖的情境下，一时惊慌地甩了那烟头，事情就会变成一场暴动。不仅那三个武警会遭殃，犯人一旦抢到了枪，很可能对住在近边的集训队干部家属进行胡乱的泄愤报复，而随后犯人会在武警一个排的反击下被全部消灭，我也会在死前变成一个“反革命暴乱分子”。——这简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在被判刑时就很自信地想过，即使共产党把我判死刑，我也不会变成真正的反革命。同时，按照我对共产党的理解，我决不会相信共产党会有对犯人实行集体屠杀的作法。可是，文革一来，一切都是七颠八倒，人的理性和信念都被“造反”泯没了，一切都不像原先那个共产党的作法。《宪法》被撕成揩屁股的手纸，连国家主席都得不到人身保障，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就拿今天来说，有人冲击监狱，干部应该向犯人说明实际情况，讲明政策，安定犯人的情绪；决不应该对犯人封锁消息，把犯人赶进一个小山洼，用机枪对着，造成犯人的内心恐怖。（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传遍全国以后，犯人在面对机枪时的恐怖心理，是必然的。）而且，即使上面没有“可以集体处决犯人”的指示，谁能保证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劳改干部与武警战士，在遭遇类似“冲击监狱”的突发事件时，会不会有不把“牛鬼蛇神”当人的残暴行为呢？在文革那“越左越好”的时期，“左”是不会错的，残暴已是“革命”的标志。所以，我虽然庆幸自己没有甩下那杆叶子烟，没有造成惨剧，没有辜负劳改犯人对我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值得向老天爷叩头的。但是，我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因误会而造成了一次流血的暴乱，那也不能怪我！

平反以后，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间，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发生过集体屠杀“牛鬼蛇神”的暴行。首屈一指的是湖南的道县，两个月杀了 4950 个“地富反坏右”。我更深刻地感到，我算太侥幸了。

我平反后，八十年代初和刑满出狱的“熊笨三”会面时，往事都成了笑谈。他说：“那天幸亏你那杆叶子烟燃得慢，要是燃得快，一下子烧到了你的手，你慌急慌忙地一甩，那就不晓得要成啥样子了。”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

---

【蓦然回首】

##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杨 政

朱多锦在大学时的名字原叫朱孝全，后名为朱晓泉。我们是 1965 年暑期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们是中文系 65 级，这一级有三个班，我是一班，他是三班。文革一开始，朱多锦也曾跟着“革命”过一阵子，但是，很快他就拒绝参加文革中的所谓“革命活动”而将文革作为一

个研究对象开始了他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多少年后，他的一位朋友在写给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他：

你在昨天捡起一段沉重的历史/它的名字叫“文革”/你说：“我把它拿到明天研究研究。”/——你几乎搬不动它/你为搬动它曾被坠进地狱。（徐树爱《思考命运的思考》）

在大学时，因与朱多锦（朱晓泉）同级不同班，一开始对他并不熟悉。听到“朱晓泉”这个名字是在上大学的第三个年头（1967年）了。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热火朝天，“革命派”开始夺权，山头林立，派战不断，而一些人或渐趋逍遥、消极，或为自己没能跟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惶惶不可终日。朱晓泉这时却断然拒绝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活动。这已经是够出格的了，更有甚者是，他竟在这个时候开始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开始偷偷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就开始了他的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文革’中研究‘文革’，先是预言‘文革’的前途（他预言，‘文革’一定是个否定之否定的前途——**笔者注**），接着是对‘文革’兴起根源的思考，其中又先有着为寻找‘文革’兴起根源而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思考，于是便又有着为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而对自己的思考的思考。”（朱多锦《炼狱自己》，见诗集《沉思岁月》第249页）。

当时，同学中对他反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议论颇多。为了观察文革发展态势，他广泛搜集各种类型的资料，以至于几乎成了搜集资料的狂人。他不分昼夜地在大字报栏前抄啊抄，忘了吃饭，忘了休息。他去外地串连，亦进行着这件他认为神圣的工作，于是山东师范学院铺天盖地、无以计数的大字报、全国各地许多大字报和油印小报，都不断地汇集到他的手中。当时有收废品的到校园来，很多同学就将一些油印大字报底稿都当废纸卖了，他就用从仅有的几元钱的助学金中挤出来的钱再买回来。现在，他说他掌握了文革的很多资料，应该

不是妄言(今天,对他所占有的关于文革的资料,有人出惊人的高价收买,但他拒绝出卖,虽然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关于他搜集文革资料的事,还有这样一段情节:当年,我们“分配”工作后,终于离校了,当大队人马走后,朱多锦因不能分配,还留住原来的学生宿舍里,而他到了这个时候,却还在搬空的各间宿舍里寻找大字报、油印小报等文革资料,忙得不亦乐乎!据朱多锦的日记所记,1970年8月16日(中文65级同学于8月10日离校)一整天都在人走楼空的各房间里收拾大字报资料。这真令人感慨万千,命运到了那种地步,他还能有这种心情搜集什么文革资料!这一切,他当然都是不动声色地进行的(幸亏他没有声张),知道他意图和具体行踪者极少。然而,知道他是书呆子,不入群,拒绝参加文革活动的人却很多。他被视为“怪人”。当时,同学们对他是避而远之,不愿与他住同一间宿舍。这其实倒成全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自己独处一室(先是在中文系男生宿舍楼一层,走廊北面最东头靠厕所的那间),自由自在,独来独往。

由于朱多锦的文革研究行为,在1970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山师中文连(当时中文系改称“中文连”)65级同时遭难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还因此而跳楼,以至终身残疾。到夏天,我们65级的学生终于开始分配工作(65级学生本应1969年暑期就毕业分配的)——所谓分配工作就是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但朱晓泉不能去部队农场,他被留校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和他同时遭难的几个同学到那时已都被解放而和全级同学同去了部队。据朱多锦说,他当时躺在现在的省纺织厅西边的路口处,正因病而发着高烧,那时那里还是一片田地,是眼看着他的同学被一辆辆汽车拉走的。“他们都分配工作了,但我不能。”他回忆说,“1970年7月29日,中文连(系)65级宣布分配方案,在中文连,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分配工作——那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那位跳楼的同学,当时他还在医院里;还有一个女同学是因为精神出了点儿问题;我是因为被认为犯了恶毒攻击‘文革’的‘恶攻罪’,而且还被说成形成了‘反动’系统的思想体系。属于我这种情况的,我们全系学生中就我一人,全校学生中就我一人。现在说来,是因为我早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对‘文革’的否定性思考——现在是称‘文革研究’了。我在‘文革’中的‘文革’研究,决定了我终生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位置，亦即决定了我终生的命运，直到今天我还在为此而付出代价。”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宣布对他审查后，接着在一天的午后便抄了他在宿舍中的所有东西；很快又有人到他老家（齐河县赵官镇公社程官庄）抄了他放在家里的书籍，据说在他家抄出的除了他所搜集的文革资料外（大都是当时各派油印的一些大字报底稿），就是一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和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心理学》，当时去抄家的人在他村里到处调查他的家庭成份和他的表现，弄得全村沸沸扬扬，村里的人听说从他家里抄出了《资本论》就以为“他十分反动”，有的人说：“看看吧，原来这孩子竟藏着写资本家的书，真是危险！”还有人对《心理学》一书甚感疑惑，说：“这可了不得，叫他知道了咱的心理，还不知会怎样呢！”

他被宣布“留校监督劳动改造”后，1970 年秋天便随山师迁校去了聊城（那时，大学都被赶到下面去办）。在迁往聊城的山师中文系，他先是在山师南院里劳动（山师迁到聊城后，分南院、北院——南院占原聊城师范的校址，北院占原聊城农校的校址），后来（1972 年夏）又被放到山师办在聊城城外西北通往临清的公路西侧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 1973 年秋才分配工作。

在聊城能够与他有所交往的是处于相似境遇中的几位老师，他们在精神上与他同命相怜，鼓励他坚强地活下去。

山师迁到聊城后，春节到了，就要放寒假了，朱多锦几经要求，最后终被允许回家过年。一天午后，庄维石老师对他说：“朱晓泉，你过来——”庄老师把他叫到教师集体宿舍门口塞给他 5 块钱。5 块钱，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朱多锦来讲。庄维石老师在中文系原是教古典文学的，正直，性格倔强，1957 年被打成“右派”。庄老师说：“朱晓泉，我知道你很难，我给一个任务：要活下去！”庄老师使他体验到这个世间还有着真正的人情的温暖。直到今天，每回忆起庄老师来，他仍然满目深情，激动不已。

当时和朱多锦接触最多，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教育连（系）的王立功老师。当时山师教育连（系）合并到中文连（系）。他在南院伙房的时候，王立功老师也在南院伙房劳动；在伙房里，一些人常欺侮朱多锦，朱多锦只是含泪不语，王立功老师这时总要给朱多锦说上几句好话；每看到朱多锦实在没钱了，王立功

老师常就帮他一些，叫他去买件衣服；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谈心，使无助中的朱多锦有了依靠。以后，朱多锦到五七干校去了，王立功老师还去看他。文革之后，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师生之谊。后来，正是王立功老师见证了朱多锦当时的一些情况。那时，对那种生活，朱多锦已经习以为常，非但对自身的不幸不自暴自弃、自惭形秽，反而变得乐天知命，达观处之，并一直躲开人在读书、写诗，其诗思竟开始涌流。关于他那时的情况，王立功老师在后来所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写于1984年9月。见朱多锦诗作诗论选《沉思岁月》第422页）中这样写道：

……有一次，我去干校，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人正牵着一只狗——干校的那只狼狗——在草地上跑着、跳着。走近了，我才发现竟是您。您红着脸向我走来……我们并肩走过了一段路程。

“这，多好！”您没头没脑地说。

“什么多好？”我问。

“跑哇、跳哇，出汗哇，在草地上打滚啊！还有狗、羊、小河、石子，长在路边的白杨——什么都好！”我们沉默下来了。听着您的天真的‘什么都好’，我竟悲哀起来。

“那，多好——”您又没头没脑地说。

“哪多好？”

“蓝天、蓝天上的太阳和蓝天下的人——可我们头上为什么总是有着云呢？我想……”您说，“不管怎样，我们总应因为我们是人而感到幸运。人生活着，应当是美好的！”



王立功老师对此感慨万端。在王老师看来，朱多锦当时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着如此沉重打击、折磨的人，一个被命运抛弃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竟仍然拥有着这样一颗热爱人生、乐观向上的心，王老师由此想到了他平时的“总是沉默”，他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您之所以‘总是沉默’，是因为压抑。凡是必须压抑自己的人，内心里总是奔腾着情感的岩浆，只要给他一个突破口，便会有火山爆发。您这个人应当有着您自己的诗。”事情真是这样，文革后，朱多锦原来“内心里总是奔腾着的情感岩浆”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于是诗情大发，佳作连连。

薛绥之老师是山师中文系的鲁迅研究专家。当年，薛老师也曾和朱多锦在山师南院伙房一块劳动。一次，他们去拉煤，用的是一辆笨重的地排车，去的路上，朱多锦向薛老师提出一些关于鲁迅研究的问题。他问薛老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中医常是有意无意的骗子，难道真是这样？”薛老师不回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哎，小朱，今天真热——”可是将煤运到山师南院伙房后，薛老师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他说：“小朱啊，你先好好地学习，什么也先别说，听老师的话没错！”多少年后，朱多锦写出了《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1986年10月9日于齐河师范，发表于由陕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1987年第七期《社会科学评论》。见《发现与批判》一书65页）、《鲁迅“反思意识”批判》（1988年10月9日于齐河师范，先辑于1990年12月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中外文化》一书，后发表于由山东大学主办的1997年第三期《青年思想家》杂志。见《发现与批判》一书531页）等一系列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这与当年薛老师的嘱咐不无关系。

还有一位曾在中文系教希腊、罗马文学的李广熙老师。朱多锦是在山师办在聊城的五七干校认识这位李老师的。1957年，李老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倍受煎熬，当时被罚喂干校的那头驴，在干校的最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一个人只和一头驴相依为命。白天，他喂饱了驴，便将驴套在运粪车上，进城去山师南院、北院将从厕所里挖出的粪尿运到干校来，每天赶着驴车不断地来回跑。人孤独着，闷了，便和那头驴说说话。朱多锦到干校后，有时到李广熙老

师的小屋里坐坐，他发现李广熙老师正在偷偷地编一本《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仔细地将有关资料都制成一张张的卡片。李老师在那种环境里不忘治学、研究的坚韧精神感动着他。当时，李老师给了他很大的精神鼓舞，给他讲了很多希腊、罗马文学的知识。李老师的《希腊罗马神话辞典》终于文革后的 1985 年 4 月印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戈宝权先生题写了书名。朱多锦说，他在齐河师范教书时于 1985 年 6 月 28 日收到李老师寄给他的《希腊罗马神话辞典》。在五七干校，他和李老师的一些对话至今还响在他的耳旁——那是一天傍晚，他又来到李老师的小屋，他说：“天黑了——”李老师对答说：“早晨也就不远了。”

在山师南院，中文系的吉宜人老师在物质上和精神也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当时吉老师在山师南院伙房里任司务长，对在伙房里“劳改”的朱多锦、李钟琦的处境很是同情。

朱多锦的磨难是一条长长的路，从 1970 年 3 月 22 日宣布对他审查，到当年 12 月 5 日宣布定性，直到文革后，等他在禹城八中（莒镇）教书时才获平反，他说，那是 1980 年 5 月 5 日，他收到了寄给他的平反通知；直到他调到禹城一中（禹城县城），才于 1981 年 11 月 5 日收到补发工资的通知，于 11 月 20 日到山师的“落实政策办公室”领到补发给他的工资 1007 元（补发从 1970 年 8 月到 1973 年 9 月的工资，扣除其间每月曾发的生活费），到 1982 年 1 月 13 日，他又领到由禹城县教育局补发他的晚转正定级的工资差额款 360 元（从 1973 年 9 月到 1977 年 10 月）。这样，从受难到平反结束前后共 12 年——12 年成了他的人生炼狱。12 年中，他一直进行着他的文革研究（他写下的文革研究的稿纸已有很高的一大摞）和新诗的写作。这个过程正如他在文革后的 1983 年 1 月 29 日写的一首诗《我是煤，我要燃烧》（见诗集《沉思岁月》232 页）中所写的，他是“树”，在天地翻覆中被翻入地壳深处，结果变成可燃的煤，这是一种炼狱的神秘造化：

为了一个神秘的造化/整个宇宙都曾重新配调——/山，陷下去/地，隆起来/  
海，到不曾到过的地方呼啸/我带着太阳的活力/被翻进深深的地壳//铸造，铸造

...../——脱骨换胎，汗煎血熬/.....我的身躯/凝固着岁月不屈的火苗/铸造，铸造.....

这是朱多锦的命运自白和宣言。

摘自《华夏文坛》2007 年第一期。

---

【蓦然回首】

## 不要参加“走资派”

央 皿

大学同窗L君，父母早逝，与祖母相依为命。L君考上大学后，不得已只好留下祖母一人在老家务农。所幸其祖母当时虽已近九十高龄，但身体却非常健康，耳聪目明，思维亦不糊涂，加之有左邻右舍的照顾，方能使 L 君安心求学于异地。文革前我曾趁暑假之机与 L 君同去他家，见老祖母果然童颜鹤发，不愧为淳朴慈祥的长寿者。

文化大革命烈火燃遍神州大地后，学校停课闹革命，群众组织两派从文斗演变为武斗，L 君十分担心老祖母的安危，便风风火火赶回家乡探望。几天后，L 君回校，同学们问及老祖母的情况，L 君说不用担心，老祖母是雇工出身，L 君的父亲即老祖母的儿子又是船工，实属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受冲击的可能。他还对大家说，老祖母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虽然不识字，但从广播和人们的谈论中也知道了不少新知识。在见到 L 君时，老祖母竟然迫不及待地问他参加了哪一派？L 君回答参加了某某派，并且说明是革命造反派，老祖母听后，连声说“好、好，只要不参加‘走资派’就好了！”同学们无不为之大笑。

六十年代末我们分配离校，天各一方。据后来与 L 君通信中得知，当年他分配到广东，回家告知老祖母，老祖母曾问：广东是哪个国家？后得知，老祖

母在近百岁时无疾而终。至今我的脑海里仍保存着老祖母那淳朴而老天真的形象。

---

【文摘】

## **《朝霞》事件的思考**

### **——陈冀德《生逢其时》读后**

丁 东

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一些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今年8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陈冀德在文革中是《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摘译》负责人，她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如吴法宪、王力那样高，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讲述在政治中枢的亲身感受，笔下的细节也不如徐景贤丰富，但《朝霞》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是文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陈冀德这本回忆录，对于研究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 **阴谋文艺还是主流文学？**

《朝霞》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刊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帮刊”，是“阴谋文艺”的大本营。当时这样批判不难理解，但现在看，这种判断并不到位。不论笼统地说“四人帮”，还是具体地分析其中对文艺更关注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文艺思想。他们在文艺领域所秉承和发挥的不过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以及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等一套美学标准之后，文学艺术在党所控制的范围逐步工具化，从延安推向整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江、张、姚等人，只能算是某一阶段贯彻和发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马前卒，在他们之前的阶段这个角色由周扬等人扮演。他们不论是组织样板戏，还是实行大批判，都是为了贯彻毛的意图。当然，有些事他们也可

能发挥得过了头，比如江青批电影《创业》，让毛又说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话。但总的来说，不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毛、江、张、姚，一脉相承。主心骨是毛，而不是别人。

那么，《朝霞》起了什么特殊作用呢？我认为，《朝霞》在用文学手段直接宣传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方面，走在了最前头。到了文革中后期，江青插手的几个样板戏实际上存在题材的滞后，没有一出样板戏涉及到文革发生后的现实。按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大量生产歌颂文革的文艺作品，就成为当政者的政治需要。这方面，作为《朝霞》前身的“上海文艺丛刊”，正是萧木、陈冀德等人主动打造的传播平台。已经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姚文元，则迅速肯定和支持了这个平台。在这种背景下，不定期的文艺丛刊，发展成《朝霞》月刊。

一个被讳言的事实是，当时全国陆续恢复的官办文艺刊物，包括《人民文学》，莫不以《朝霞》为榜样。其他省市的公开出版物，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表达出另外的政治倾向。区别只是在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不如《朝霞》那样得心应手罢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朝霞》是“帮刊”，不如说《朝霞》是“党刊”，与其说是“阴谋文艺”，不如说是文革时期“主旋律文学”的代表，是用文学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带头羊。这些文学活动当时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恐怕谈不上有什么阴谋。而且，谢泳在研究《朝霞》时还指出了一个事实，当时全国范围内一批颇具文学才能的中青年作者，诸如余秋雨、贾平凹、路遥、钱钢、徐刚、陈思和、周涛、陆天明、黄蓓佳、古华、叶蔚林、焦祖尧、孙绍振、贺国甫，都在《朝霞》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和陈冀德、施燕平这批编辑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不无关系。如果说这些作者后来成了文学的千里马，这些编辑就是最初的伯乐。虽然他们成名后谁也不愿意再提这些伯乐。

### **《朝霞》停刊整顿风波始末**

陈冀德的回忆录，讲述了史家不曾关注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以及背后的“上海帮”内斗。

过去，人们谈到“四人帮”，只注意到他们是一伙，对他们内部的矛盾斗争关注不多。“四人帮”又称“上海帮”，起源于批判《海瑞罢官》，发迹于“

一月风暴”，1973 年中共十大达到鼎盛。“上海帮”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人，如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等，一部分是工人，如王洪文、王秀珍、叶昌明、陈阿大等。前者以上海市委写作班（后来演变为上海市委写作组）为班底，后者以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编者注）为班底。他们在 1967 年的“一月风暴”中，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整合在一起，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怎么深入？其实毛泽东脑子里也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违反常规的政治行为，毛泽东不赞成；可能被定为反革命行为，毛泽东赞成，就是革命的首创之举。上海的“一月风暴”，源于工总司等造反派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工总司赴京告状的火车被上海市委拦在安亭，本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中央常委都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但中央派往现场的张春桥却临时决定支持工总司。毛泽东后来表态：“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由此拉开了文革第二波——各省市夺权的序幕。在这个选择中，不能简单地判断张春桥就是押宝，他是参悟到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心理轨迹。而工总司这些人，则并无深谋远虑，只是在现实中和上海市委冲突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背水一战。写作班的一批文人，本来没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此前他们一系列批判文章都是在上海市委领导和支持下写出来的。决定造反，是姚文元跟他们内部通气的结果。

造反派掌权以后，工总司山头 and 写作班山头一直暗中较劲，摩擦不断。陈冀德说他们是表面“亲热得紧，背地里，水火不容”。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回忆了张春桥几次让他放低身段，弥合与王洪文的裂痕。（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 92～105 页）九大以后，张、姚回到中央工作，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当选中央委员，并分别由张春桥、江青、周恩来提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安排王洪文和徐景贤“一帮一，一对红”。王洪文在九大大会发言还是徐景贤帮他起草的，他们一度相安无事。中共十大，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前。工总司山头成员头脑膨胀，对写作组的文人大打出手，于是发生了 1974 年初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

（略。详见本刊 2008 年第十期文摘《“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

张春桥为什么要出面挽救《朝霞》？陈冀德事后分析，王知常给张春桥写信，只是讲了《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整顿”的套话，没有说出“半周年”是导火线。而她给萧木的信把这一点讲得明明白白。据陈冀德回忆，当初工总司带头大张旗鼓庆贺成立“半周年”，曾受到张春桥批评：“难道连一周年纪念都等不及啦？”而徐景贤回忆，这个批评出自于他，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但后来得到张春桥的支持。（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101～105页）不管怎么说，工总司一帮人这样翘尾巴，自乱阵脚，张春桥不能坐视。

幕后张春桥和王洪文之间如何协调，萧木又起了怎样的作用，陈冀德语焉不详，可能她也不清楚。但王洪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向张春桥妥协了。可以推测的原因是：从历史看，张春桥对王洪文的支持多多，如：一，安亭事件让工总司合法化；二，工总司原来影响最大的头目是潘国平，潘不是党员，张春桥指定王洪文成为工总司参加“三结合”的头面人物；三，张春桥把王洪文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引起毛的重视，并于196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王洪文感兴趣，王才有机会在中共九大代表工人作大会发言；四，张春桥看到毛泽东要物色工人领袖，让王洪文在上海市领导班子的地位从“王小七”上升到第三位，主持上海工作，使王有可能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毛泽东属意为接班人。可以说，没有张春桥的几步提携，王洪文不可能爬到后来这么高。就是调萧木来北京帮助他学习工作，也是张春桥要帮他包装理论形象，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当然，即使王洪文党内职务排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面，“四人帮”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是江青最威风，张春桥最有主见，王洪文不免还是小兄弟。他手下工总司一帮人，更不能不把张春桥视为“老爷子”。

工总司山头只顾自己逞强，导致大水冲了龙王庙。张春桥以不伤害王洪文面子的方式，摆平了一次内讧。应当说，平息《朝霞》风波，表现了张春桥的老谋深算。

### 张春桥为什么要陈冀德写信？

张春桥虽然在中共九大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中共十大以后又当选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一直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

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承认上海是张春桥的势力范围。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造成的。上海领导机构里的文人和工人都是张春桥一手提拔起来的，被结合的老干部马天水对张春桥也是言听计从。但张春桥仍然意识到，身居京城，了解不到上海的第一手情况，送上来的简报都是投其所好的顺耳之言。他想建立另外的信息通道。通过陈冀德的告状之举，看到陈冀德是敢言之人，于是主动约陈冀德直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这或许和毛泽东看中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的道理相似。他们并不想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路线、方针，但想以局部修复的方式，**弥补信息不通造成的问题**。

陈冀德先后给张春桥写过四封信。前三封信不免都是批评工总司的王秀珍、陈阿大这些人事事处处凌驾于党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张给陈回过两封信。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回信居然是让陈谈对样板戏和《创业》的看法，并一再说不不要外交辞令，要说真话。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对八亿人反反复复看八个戏的局面已经不堪忍受。但江青还是一意孤行地普及样板戏。对于不是她直接插手的文艺作品吹毛求疵。历史地看，电影《创业》无意与江青唱对台戏，内容还是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她仍然通过于会泳罗列了“十大”罪状。编剧张天民忍无可忍，向毛泽东告了御状。毛泽东才有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说法。样板戏是江青的心头肉，《创业》是江青的心病。**张春桥知道人们对江青不满**，为什么要让陈冀德在这些敏感问题上说出真实感想？是他想进一步印证实际情况，还是他对江青的不理智也有自己的看法？外人不得而知。但这个细节毕竟提供了一个研究张春桥和江青关系的线索。

张春桥点题，还让陈冀德谈谈对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看法。陈回信谈的居然是农民生活太苦，文革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文革后上台的新干部在特殊化上比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一个问题，张春桥也不是不知道，徐景贤也向他告过状，他只能以“敌存减祸，敌去招过”提醒手下的文人，不要忘记否定文革的力量其实很强大，现在不是和工人造反派分裂的时候。

筹备中共九大时，陈伯达起草政治报告，主张发展生产，毛泽东不满意，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一直到十大，“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调子越唱越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成了张春桥的理论专利。即使他知道文革中老



百姓生活很苦，他也不能改口。一旦失去了这种话语的路径信赖，张春桥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陈冀德说了真话，张春桥无言以对。

## 文人和草莽

陈冀德为《朝霞》的生存告状，给“上海帮”在中央的三个大员留下深刻印象。1976年5月，陈冀德到济南开会后进京，王、张、姚分别接见。

她先见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为了表明接受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批评，为避嫌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东城区的一处中式宅院。院子很破旧，灯光也很昏暗。陈冀德问萧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萧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都磨破了，没有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吴桂贤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到姚文元和她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一起访问阿尔巴尼亚，从宴会厅出来，姚文元居然把吴桂贤的军大衣穿走了。吴桂贤的军大衣找不到，在阿尔巴尼亚引起一场虚惊。

第二个见的是张春桥。她的印象是张春桥会见她的客厅在过道里。从张春桥那里谈话后，是萧木带她去钓鱼台职工食堂吃饭，一般得很，也就是馒头、馄饨、面条之类。

第三个见的是王洪文。陈冀德并不想见王洪文，王洪文要接见她当面消除“误会”，陈也不能拒绝。但王洪文见陈冀德并不想谈什么，只是请她看电影参考片，找了六七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喝茅台。

陈冀德的直观感受，王、张、姚三人的生活追求差别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及时行乐，但张、姚在生活上并不奢侈，姚文元甚至有些寒酸。“四人帮”垮台以后，对江青、王洪文生活上的奢侈有揭露，但不见对张、姚这方面的揭露。看来不是对张、姚留情，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留下把柄。有意思的是，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也曾致信张春桥、姚文元，反映王洪文沉迷于酗酒、玩牌、打猎，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期间用名酒佳肴几次宴请上海市的一班领导成员，并热衷于调看内部电影，以合法和非法途径享受进口奢侈品。

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与今天相比，可以说物质上相当匮乏，而制度对干部生活享受的约束比现在严得多。像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当

了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享受高级干部的工资。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以后，还是挣七十几块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两角钱一小包的茶叶都喝不起，只能喝白开水。陈永贵还是在大寨挣工分，国家给他每月一百元生活补助。王洪文吃、喝、玩、乐，靠的是特殊手段。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调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大量产品去，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就成了王洪文一伙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信任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见《十年一梦》第298～299页）

历来的造反者，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人，一部分是草莽。文人可能有脆弱的一面，但在文人的头脑里，不论是古代的圣贤之理，还是现代的革命之理，总还起些约束作用。张春桥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也不能说不是他的信仰。而草莽揭竿而起，以命相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上台后及时行乐屡见不鲜。王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正是这样的草莽。他们掌权后就急于鸟枪换炮，住好房子，坐好车子，享受“特供”。工人造反派取代了“走资派”，结果腐化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走资派”。研究造反派掌权后文人和草莽的内斗，对于理解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不无启发。

陈冀德对张春桥毫不隐讳自己的看法，认为工总司这些人是“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一伙人的群体利益为首，为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不考虑阶级的利益，更别说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徐景贤也有类似的看法。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选择王洪文做接班人。纵观“一月革命”开始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结合”的“夺权”斗争，其实多数省市都是以军人掌权为主，以地方干部为辅，造反派在领导班子里只是点缀。如果把张春桥、姚文元也视

为旧市委的造反者的话，唯有上海的班子是以造反派为主。不论是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工人造反派，还是徐景贤这样的文人造反派，当市委书记确实是大权在握，而上海市领导班子里军人只是陪衬。和毛泽东亲历武汉“七二〇事件”对当地文革的失望相比，上海在毛的眼里实在是文革成功的一个范本。为此，毛泽东也想让张春桥做接班人，但核心层里林彪、康生先后都曾表示对张春桥的反感，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在中央委员这一层对张春桥几乎是人人喊打。毛泽东只好把目标转向王洪文。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了。”（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97页）然而，这些理由即使当时自圆其说，也不能改变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刘盆子”的事实。毛泽东让他试了两年，不行，只好又转而选择邓小平。认定邓小平否定文革，只好又转而选择华国锋。

“上海帮”已经成为一页历史。但是，他们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公开的传媒里，我们看到的有关他们的图景大多以漫画的面貌呈现。陈冀德在“四人帮”倒台后曾被关押审查多时，解脱后受到处理，不得从事文字工作。30年过去了，历史经过沉淀，陈冀德也进入晚年。她决定按照内心的想法写回忆录。虽然在大陆没有机会出版，但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还是给她提供了一吐真言的机会。书名取《生逢其时》表明她内心有不平之气。我想，对于这样的历史当事人的文字，不妨抱以理解之同情，从中不但可以获取被遮蔽的信息，而且可以反思有益的历史教训。

摘自《领导者》2008年12月号（总第25期）。

---

【故纸堆】

##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1968年2-3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由北京众多高等院校文革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旨在使各高校中敌对的群众组织进行“大联

合”。蒯大富在这个学习班有关会议上和谈话中谈了他自己的一些“夺权、掌权”的经验和体会。后经人整理成文，在北京许多高校不胫而走，成为所谓“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当时还有一个题为“掌权三十六条权经”的相同内容文本)。蒯大富本人并没有对自己的这个发言或谈话冠以什么名称，也无法左右这个所谓“权经”的广泛流传和不同评说。随后在毛泽东批发全国作为清理阶级队伍样板的“六厂二校经验”中，迟群又在代表清华工宣队所做的报告中对“三十六条权经”作了择要批判，从而使之传遍全国。这个所谓“权经”的形成、传播、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革前期群众政治文化的一种折射或注解。——唐少杰

1. 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2. 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太痛心了。
3. 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4. 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5. 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下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功的人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政治代表、群众代表)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6. 凡群众中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7. 主要领导人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8. 要诚心实意待人。
9. 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10. 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11. 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12. 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13. 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许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14. 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15. 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16. 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17.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18. 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19. 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20. 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以赏为主。
21. 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22. 要谦虚。
23. 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会被臭哄哄地赶下去。
24. 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25. 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26. 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27. 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28. 要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29. 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30. 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31.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32. 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33. 当处于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34. 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反映，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多。

35. 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多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36. 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

#### 【故纸堆】

按：据文革传单记载，“鸡血疗法”的发明者是上海永安疗养所所长俞昌时。大跃进期间，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语境下，此疗法被视为一种技术革新成果，并上报卫生部。1965年，卫生部发文禁止。文革初期的1966年底，卫生部的禁令被视为“资反路线”受到批判。此疗法遂风靡一时。目前网上对它的来历和在文革中的流传有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为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兹将当时诸多传单中的一种摘要如下。原件为油印传单，传单原文的有头无尾，条理不清，语多病句等均保留原样，只省略掉那些具体治疗方法、疗效之类内容。

#### 有关“鸡血疗法”的传单（摘要）

## 最高指示（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急件》

关于撤销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65）卫医第 103 号文件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是有问题有错误的，今后有关“鸡血疗法”应用、研究等问题，另行发文通知。

根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意见，我们同意将这两个文件随文发给你们并请转发给以前发过文的下属单位。

附件：

- 1、在医药科学上为毛泽东思想翻案（革命造反宣言）。
- 2、彻底为医药科学研究中的新事物——鸡血疗法翻案。

## 告全国人民书

1966 年 12 月 28 日

主送：总后勤卫生部、铁道卫生局、中华医学会、健康报社、本部各司局、政治局医疗处、鸡血疗法筹备办公室。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中央卫生部、上海市卫生局在科研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印。

1、鸡血疗法是一种非特异性的生理疗法。即是强壮疗法，它是促进大脑皮质起平衡作用，从而产生天然疗能，所以它对一切疾病都有极为显著疗效。而且它不仅是有病迅速治病（生有几种病同时治愈）而且无病促进健康。同时又可促进儿童及发育不良的人生长发育，又可促进怀孕。由于它是生理疗法，所以它没有禁忌症，用不着确实诊断，更不用讲什么疗程。对任何病打好为止……我自己夫妻、子女和一些老友，都已打了七年多了，我把它当作“祛病延年”的最好方法应用的。……

2、治疗病症，有下列各病具有过奇特疗效的病例……（下列 89 种急慢性、内外科病例略）

3、注射方法……（略）

4、鸡血的选择……（略）

5、抽血部位……（略）

6、鸡血保存法……（略）

7、反应问题……（略）

鸡血疗法确系多、快、好、省的、对任何病种都有过奇效的、超过国际水平的疗法，中央卫生部已撤销禁用通知，希望大力推广应用，并希作记录，把注射后的情况填入下表内寄给我以便交流经验，提高研究，为发扬祖国医学，创造新医学派而共同努力。

俞昌时 上海陕西北路 597 弄 6 号 4 楼

## 鸡血疗法

### 一、鸡血疗法的开始

1952 年 11 月我在西南南平工作时，偶尔在鸡的肛门口试了试体温，发现体温在  $43^{\circ}\text{C}$  左右，从而联想到其鸡体温能够如此之高，当然是神经调节中枢和血发热机能特别高的缘故，因此它的大脑皮质上起平衡作用，从而促进生理机能调节新陈代谢，以及它的抗菌抗毒能一定很强。

我想起在祖国医学文献上应用鸡血治疗疾病的记载很多，它的应用方法是服、涂浸、点（点眼有奇效）。我就应用注射方法把鸡血注射在人身上而不发生不良反应，一定会产生对人体有益的作用，加之当时盛行组织疗法，我想鸡血也是一种血，我反复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在自己身上先试一试。……以后我转到上海工作，在永安疗养所任所长兼医师，病床迫使我无力研究鸡血疗法，直到五九年大跃进时又搞起来……组织了鸡血疗法研究小组，做了一些简单的动物试验和临床应用，都很成功。中央卫生部审查后指出：此法因超过国际水平，必须保密，所以至今不被一般人所知道，转眼已五年了。

### 二、鸡血疗法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略）

### 三、鸡血疗法和我的愿望……（略）



鸡血的采取和保存……（略）

注射方法……（略）

反应问题……（略）

发展前途……（略）

毛泽东思想勘探兵翻印 1967 年 5 月 24 日

贵州新华印刷厂小兵再翻印 1967 年 6 月 10 日

毛泽东思想新华印刷厂铅印造反派再翻印 1967 年 6 月 15 日

贵州轻工业厅革命群众再翻印 1967 年 7 月 8 日

---

#### 【小资料】

###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1968 年 2 月 5 日成立 ）

主任——

曾思玉，57 岁，江西信丰人，武汉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刘 丰，53 岁，河南浉池人，武汉军区政委

张体学，53 岁，河南新县人，原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

任爱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

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朱鸿霞，34 岁，工人，武汉重型机床厂检验员，“钢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主要负责人

饶兴礼，43 岁，劳动模范，原湖北省贫协副主席

杨道远，27 岁，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学生，“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武汉测绘学院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张立国，23 岁，华中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新华工”（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华中工学院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委——

赵兰田，50 岁，武汉空军副司令员

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

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方 铭，47 岁，浙江宁波人，空降兵第十五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张纯青，空降兵第十五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

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

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姜 一，49 岁，原省委候补书记

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

李镜如，原省粮食厅副厅长

丁 力，原省经委副主任

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

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 舜，女，原地质局局长

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

胡厚民，31 岁，武昌铸钢厂工人，“钢工总”负责人，中共党员

夏邦银，33 岁，汉阳轧钢厂工人，“钢工总”负责人，中共党员

邓金福，武钢炼铁厂工人，“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负责人

钟锡钢，31 岁，武汉冶金机修厂工人，“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负责人

潘宏斌，36 岁，武汉市第六紧固件厂工人、**中共党员**，“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

顾建棠，36 岁，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长办联司”（长办造反联合司令部）负责人，长办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党员

王 屏，女，33 岁，武汉国棉一厂工人，“钢工总”负责人，国棉一厂革委会

主任，中共党员

杨玉珍，女，34岁，武汉钢铁公司机械总厂工人，“钢九一三”负责人

方保林，22岁，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负责人，武汉机械学院革委会主任

龙铭鑫，26岁，湖北大学“新湖大”（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负责人，湖北大学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谢华之，21岁，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生，“三司革联”（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负责人

郑军，23岁，团省委干部，湖北省直属机关“红司”负责人

本名单经由文革研究专家余汝信、钟逸先生根据历史资料及对亲历者的采访补充修订，谨致谢忱。

---

#### 【编读往来】

一、印红标寄语编者：《记忆》应继续坚持现有的学术品位，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无论什么观点的来稿，只要人家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就应该给它们一席之地，让它们发出声音。要把《记忆》办成一个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交流的平台。不要搞党同伐异，不搞小圈子，要坚持五湖四海，唯如此，才能不断地提高它的学术水平。

二、庄瑞菁来信，对本刊第十二期及历史研究发表了诸多感想，兹摘录如下：

1、郭路生这个事我没太看懂，他是个真神经还是假的？这篇文章是在讽刺有人篡改郭的文字？还是……实在想不出会出这样事的理由。

2、这次的《记忆》，让我对徐景贤有了多一些的了解，对他的记忆，一直是政治化的文革式记忆。作者这样写，虽然有他的理由，站在他的角度，老徐的确是个人物，不差的人物。他怀念他有道理，一是放不下自己的过去，二是，从心里讲，他并不觉得文革中他们这类人有错。但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站在整体的，超越左右的立场上，他的这篇文章，对整个社会对文革的认识，起不

到正面的作用。我感觉，这篇文章属于本期徐贲说的那种文革怀旧。

3、《牛马走》挺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有点忏悔感觉的文章。尽管是替自己伸冤为主，但多少也对过去的行为表示了内疚。“牛马走”这个名称挺新颖，也很形象。

4、我们对周恩来总是拔得太高，直到现在也没能摆脱神话般的感觉。周的地位决定了，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上，在文革上，他必须要负上相当一部分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大家总是不自觉地为她遮掩，有意无意地把他摆在所谓的忍辱负重的位置上，这恐怕和事实相距甚远。周的为人很精明，他把道家的那套学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要客观地，真实地描绘这个人，让所有人都看清它的真面目，恐怕还要费些力气。

5、看了《记忆》，想到了一些问题。也是这阵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于历史事件，时空不同，观念不同，给予的评价就不同。研究历史，不可能没有主观印象，时代烙印。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不就是前人对历史的评价吗？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根本不是历史真实，只不过是历史回忆，或是当年的官方定义。这样的史料，不能太认真看待吧？就是当个参考还不知道能不能真有价值。最近看了不少揭露文章，引经据典说明《岳阳楼记》等典范文章的打扮历史、歌功颂德等黑幕，让我很感慨。历史该如何研究，真是个大题目。看待历史，要有距离感，超然于事件之外才能有相对的真实性。但有多少人能注意这点？从看到的文章来了解事件，误差该有多大？如果一个年轻人看到怀念徐景贤的文章，说不定把他当成末路英雄来看，就像我当年看小说《红岩》一样，向英雄致敬（这也是代沟产生的原因之一吧）。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不同的社会位置产生不同的文字，想要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读历史书籍，要留个心眼，小心被古

人忽悠。

6、应该如何看待文革中的那些造反派？他们和那些 100 年前的革命分子有什么区别？这些人，身上都具有革命的激情，天生的不安份，只要时代合适，就起来造反。抛开意识形态，无论是推翻皇帝还是炮打司令部，都是幼稚的年轻人在当炮灰，革命的成果他们享受不到，只有牺牲的份儿。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但他们还是一茬又一茬地前仆后继。为什么？年轻人的热血？满足参与感？我还没想透。

7、辛亥革命 100 年了，我们的国家又处在和 100 年前一样的十字路口上。又有人在呐喊，要自由民主，推翻专制.....和 100 年前革命家的言论没什么两样。中国的民众和 100 年前的也没什么两样，还是农业人口占多数，还是群体性多于独立性，还是不如西方的民众素质高.....要暴力革命还是要和谐渐进？也是和当年一样的两条路，只不过选择可能不同，因为国际大环境是民主、和平、理性。不像当年，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是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历史又在重复，我们也跟着重复演大戏。离开一段距离，抽出身来看待民国，国共两方面的精英都没有错误，无论选择何种阵营，都是大时代下的产物，情有可原（文革中的两边，是不是也可以如此定义？）。可悲的是，100 年来，大家都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意识形态依然是 21 世纪中国人的主题。看看欧美，人家早就从大战的悲剧中走了出来，把意识形态仍在了脑后，专心致志经营民生，社会也为之进步，实现了真正的和谐。相比之下，我们真是可叹。背后的原因在那里，民族性，还是.....我还没有想好。